

张群先生话往事

张群口述

陈香梅笔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写在前面

张岳军先生今年一百零一岁了。这位四川的人瑞，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张群资政。我和他可说是忘年交，蒙他不弃，虽然近年来他体弱多病，但每次我到台北，都要去看望他，和他谈谈。最近一次是今年的十月中旬。

我约好了早上十时去他士林的私寓看他，他在那房子里已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夫人马育英女士也是在那儿过世的。他们初到台北时住在城里，房子较小，但常常高朋满座，因为岳公夫妇人缘好，又好客，大家都欣喜和他们做朋友。张夫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心口如一，乐善好施的人，没有半点贵夫人的习气，这在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张夫人去世后，张老先生真是失去了相敬如宾的老伴。还好张家的子女和儿媳都甚有孝道，对于老人可说甚尽职责，尤其是张继正夫妇，和老人同住，奉侍起居，这在今时世风日下的境况中，更不多见。

岳公生于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他的出生地是中国的四川省华阳县。他出生时正是日本不断压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若干屈辱的条约。当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仇恨日渐加深，但更痛恨清朝政府之无能。就在那个时候，日本派兵入侵朝鲜，在进据朝鲜之后还乘机横渡鸭绿江，

进入东北境内，又自旅顺渡海，进军山东，接着又挥军南下，占领澎湖群岛，进逼台湾。无能的清政府只好派李鸿章赴日议和，等于求和，这就是有名的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条款是：（一）承认朝鲜为自主国。（二）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与日本（后因俄、法、德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出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由中国出款三千万两黄金赎回）。（三）赔款二万万两。（四）开长沙、重庆、苏州、杭州等处为通商口岸。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都因清政府之无能和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所致，后来日本人还在马关行刺李鸿章，真可以说是残酷绝顶，苛刻之极。

1900年，中国又发生了义和团之变，义和团徒众进入北京，侵袭外国使馆，清政府无法制止，于是英、俄、法、德、美、日、意、奥等八国乃采取联合行动，进兵中国，这就是有名的“八国联军”之役，日本更借此逞凶，两个月的战争，败者当然是中国，最后又由清廷订了所谓“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共四万万五千万两，而日本共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余两，占全部赔款率百分之七点七三。这之后不久，1904年日俄战争，而其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而且是为争夺中国领土而战，结果俄国又把在中国领土上所得权益转让给日本，最重要之一点是辽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等都开埠通商，准许外国人居住，开伐鸭绿江森林，而东北的中东铁路全由日本经营。

岳军先生就是在这种充满耻辱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时孙中山先生已于各地倡导国民革命运动，激起了无数

青年救国的意愿。而生长在四川省的张群也决定投笔从戎，入了保定军校。后来于1907年冬又被录取送往日本留学，到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政府专为中国留日军事学生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三年毕业后被分发到新泻高田第十三团野炮第十九联队见习。当年蒋介石也在此与张群相识，并且同地见习。建立了他们两人七十年的交谊。

我常问岳公他对日本既有如此仇视心理，为何却要去日本留学？他告诉我，原因甚多，第一，中国青年人都公认清政府无能，若要对付日本，首先要了解日本，而且当年日本正厉行明治维新政策，清朝维新行不通，日本却成功，定有其因素，他很想去了解、充实自己，谋求协助国家富强的知识。第二，是要取求新的军事学识，以便回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第三，孙中山先生已在日本创立了同盟会，招收同志，蒋介石和张群都同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张群回国参加了陈英士在上海发动的革命战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了平息南北的争议，让总统位子袁世凯，不料袁氏竟欲称帝，于是孙先生只好又发动讨袁，史称“二次革命”，不幸事败，张氏夫妇第二度逃亡日本，1916年袁世凯病亡，革命党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推孙先生为大元帅。张氏和蒋介石被委任为元帅府参军。这是张氏前半生与蒋氏的结合，其后在对日抗战前数度与日本军政人员办交涉，对日本

人认识最清楚，对中国军阀认识也最清楚。

1935年张氏出任外交部长，与日本人忍耐地谈判，直到1937年3月离职。他曾多次对我谈到他那时工作的艰巨，直所谓弱国无外交。在这期间还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年轻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在蒋介石访问西安时，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要蒋氏马上宣布全国抗日。

我多年来劝岳公写自传，他不肯。他说他不方便写。这一点我极不同意。十年前他总算出版了一本《我与日本七十年》的书，这儿所写的有不少是他亲口对我详述的史事，也有一些是引自他的那本著作。前几年他身体还不太坏的时候，我替他写了一本《与张岳军谈往事》，是抛砖引玉，把他那本《我与日本七十年》的书引出来了，张氏的日记手册不少，据他说全部交给了中国国史馆。我每次劝他多写点近代史，对后人有个交代，他总说：“你写嘛，你来写我就放心。”可惜我二十多年来还有许多事疲于奔命，无法替他服务。

现在我想谈谈这位极有风趣的老人，他对人生有一套胜于常人的哲学。比方说他心胸宽阔，为此追随了蒋介石七十年，在复杂的环境中是个不倒翁，在蒋氏天下又得应付孔宋那些权贵，又得为蒋氏做和事老，七十年寒暑如一日，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他的特点是不为自己私利而争，凡事看得广、远、阔。所以他说：“一笑一少，一怒一老。”又说人生七十方开始，多么豪人豪语！

他也会喝酒，而且有一番哲理。他说：“喝酒有些条

件，第一主人要好、第二客人要好、第三酒要好、第四酒品要好、第五下酒菜要好、第六谈话要好、第七光线要好、第八环境要好、第九太太要好，即使喝醉了，回家也不挨骂。”我常拿他这些条件向友人介绍，大家都非常佩服。

张氏早年对于中国艺术古玩多所收藏，尤其是书画。他和名画家溥心畲、张大千、蓝荫鼎都是好友。于今只剩下一位黄君璧，而黄君璧身体甚差，两人无法再往来。

使我感动的两件近事，一是岳公为张少帅和赵四小姐做证婚人。一是参加了张学良将军的九十大寿。还有他把自己珍贵的收藏全部送给了台湾的故宫博物馆，不自珍爱而让大家分享他的稀有珍宝。

陈香梅

目 录

| | |
|------------|-----|
| 写在前面 | 1 |
| 谈谈我的早年 | 1 |
| 谈谈我的婚姻 | 6 |
| 谈喝酒 | 12 |
| 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 14 |
| 任外交部长的回忆 | 29 |
| 访日归后述感 | 65 |
| 对日往事 | 71 |
| 论“敌友之辨” | 83 |
| 张群著《谈修养》 | 94 |
| 张群简历 | 102 |

谈谈我的早年

我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出生在四川与云南交界的一个小县份。那时父亲在该地做官。我共有兄弟三人,姊妹两人。八十年前,滇川边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落后的不毛之地,我小时的教育都是由父亲延师到家授馆,我也参加过清朝的会考,不过后来因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川招考学生,我在成都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这一件事可以说是决定了我一生的大计,因此与蒋先生相识,同学共事,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童年的事,也可借此了解当时我家乡的生活环境,以及医药的缺乏情形。

我十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了。当时家里请了和尚来念经。那时是冬天,农村里用的是泥做的火炉,泥炉中有一个洞,生火的人用一铁管在洞中上上下下地转动,借此控制炉火的大小。我当时童年无知,又好奇心重,看见大人生火,觉得非常有趣,于是趁着大家离开灵堂休息的时候,偷偷地拿起了铁管,拼命地往火孔中推转,哪里晓得炉火已经很旺,再加上我不停地煽动,泥炉忽然爆裂,一块红热的火块竟跌落在我的脚背上。当时我穿的是缚带

的帆布鞋，火块粘在脚背上，又痛又急，于是大声呼救，等到大人来把鞋子袜子脱去时，鞋袜固然差不多已成灰烬，我的一只脚也几乎见骨不见肉，一直痛到心坎里。这件事，如果在医学昌明的今日，早已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诊治，但七八十年前的农村，不但没有医生，也没有现成的药品，这时只有听候家人的安排，把一只脚泡在酸水里，这更增加痛楚，不过据说可以消毒，防止溃烂。这一场灾祸害得我很惨，一连三个多月不能行动，结果总算无医自愈了。

后来家父宦移成都，我们算是迁居到大都市。在那时，大家已渐渐感到清廷的腐败，我是十来岁的男孩，在成都也有机会读到一些革命性的读物，心中的革命意识也在此时渐渐生根。我就这个时候考取保定陆军学校，决定投笔从戎。家父给我六十银元，作为旅费，赴京参加会试。当时同行的有另一位青年朋友王君，我们两个性情相投，志同道合。会试时，由段祺瑞亲自召见，监考官就是他的部属，他叮嘱我们在拜见段祺瑞时，一定要行请安礼（即北方旗人的屈膝半跪式见面礼），我认为这有失我的尊严，于是我对监考官说，假如要行这种旗人请安礼，那我就宁愿弃考回乡。我的监护人，也就是我的保证人急得要死说：“这怎么可以呢？而且你若弃考，那么连回家的盘费都没有着落，你还是将就一点吧。”我和同学王君商量，两人决定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题，来个交白卷，看他们如何发落。两人商量妥当后就假

装同意去应试，同来的监护人也就高兴万分。那次考试的课目共分三科，即国文科、数学科和理化科。数学和理化我为了表示抗议根本一题没有作答，但国文题目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大做文章，自己也认为非常满意。本来我想既然我交了两科白卷，一定不会被录取，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与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同得到段祺瑞的召见。这时我又对监护人提出抗议——我拒绝请安。这可难为了监护人，他们一半劝说，一半威迫我就范，我想当时大家一定认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爷驾到后，我们被个别点名去见段氏。轮到我时，我只向前走了几步，点点头，左右的人高声喊“请安，请安！”我当时年轻气盛，马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他们见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强。我想其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叛，遇到我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与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军校训练一番为上，这也许是欲擒故纵之计。

我本来为了反抗代表专制的请安以及与请安相同的各种规定而不愿进军校，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顺利过了关。我也只好暂时听候安排，准备到了学校再作道理。到校之后我当然不像其他的旗人学生那么百般服从，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出了一个国文题目，我认为可以借题发泄我心中不平之气，于是又大发牢骚，发挥我的反专制言论。学校的校监对我真是无可奈何。总想找一个机会，把我放逐到什么地方去，以免在学校生事，而减轻他的责

任。

时值清廷正计划保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一天晚上，我已在宿舍就寝，忽然校监来到宿舍把我从睡梦中推醒，他说：“你已考取了留日考试，马上就要你去日本。”我一时大喜过望，人也醒了，这是光绪三十四年的事。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当年一同在日本留学的，现在已多数不在世了。硕果仅存的人，也都垂垂老矣。

武昌起义，我和蒋先生乃从日本偷渡回上海。我还记得当时蒋先生穿着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装。我们的名字已在清廷的黑名单之中，通缉令发表时，日本人到处抓人，可是我和蒋先生已在东京回上海的轮船中。到达上海时，我口袋内仅剩下了一块银元。

回国后不久，就参加陈其美（英士）先生领导的上海革命战役。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先生任都督，黄膺白（鄂）先生任参谋长，我任军务处军械科长。

蒋先生回杭州参加革命，浙江光复后，组成新军一团，开至上海，称沪军第五团，蒋先生自任团长。后来扩编为二十三师，黄先生任师长，蒋先生仍任团长，我任参谋。

革命虽然成功了，但那只是昙花一现。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又亡命日本。

这时我已在上海结了婚，我的内人马育英也是革命同志，与我同岁，是江苏昆山人。

我第一次去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三年毕业。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资格，分发到新泻高田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与蒋先生同队。

第二次去日本，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讨袁失败之后，上海袁氏爪牙大捕国民党人，我与内人及许多同志一同亡命东渡。这时日本政府恰巧宣布辛亥年在联队之士官候补生，可以正式入陆军士官学校，我乃又入士官继续学业。内人马育英则入长崎活水女子学校深造。

我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时在民国四年（1915年），国内政治环境愈劣，袁世凯正阴谋恢复帝制活动，不容许我们回国，日本又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袁氏接受。在日本我们也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我只好应友人之邀，到荷属印尼爪哇的中华学校去教书，到民国五年（1916年）才自南洋返国。

谈谈我的婚姻

内人马育英女士在世时，许多朋友都羡慕我们的美满姻缘。自1912年结婚起，迄1974年内人逝世止，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多的岁月，而且互爱互敬，这在世界上确是罕有的事。

谈到我们的婚姻，就要回溯到民国以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位同学王柏龄，是扬州人。有一年暑假，他要回扬州老家，顺便约我到扬州去玩。那时，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这些有名的名胜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但是，扬州的湖光山色我是向往已久的。扬州有个瘦西湖与二十四桥，古人诗中有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诗句，我早都读过。所以一提到扬州，就引起了我的兴致。决定和王君同路经上海，前往扬州一游。

在经过上海时，我顺路去拜访一位姓张的本家，他从前在四川中学里教过英文，是我的老师。我知道他在上海，顺便去拜谒他。当时他给我介绍了好些他的亲友，并且约我和他们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

了一位在教堂任职的朋友丁文骏。

民国元年(1912年)我再去上海时,又会见了丁先生。他古道热肠,自动地要替我做媒。因为丁先生在礼拜堂任职,所以时常约我同去做礼拜。我们做礼拜的教堂叫怀恩堂,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他给我做媒的对方就是怀恩堂中弹钢琴的小姐。

那位弹琴的小姐就是我以后的太太马育英女士,她是江苏昆山县人,生于民国前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讳霞城,我的岳母是他同邑的彭金凤女士。马家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七岁那年,霞城公弃世,接着他的两弟一妹也先后夭折,遗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岳母去上海,入圣经学校,毕业后任传教工作,往来于上海昆山间。育英以受母教为多,十一岁时,因得浸信会吉慧丽、柏乐提两教士之助,得入上海浸信会主办之晏摩氏女子中学就读,十三岁受洗归主,十九岁毕业后,就应扬州慕究理女子中学之聘去教书。三年后返沪,再回母校晏摩氏女校任教。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因丁先生介绍,得识育英。

经丁先生介绍后,我们时常见面,但都是有往无来。因为当时晏摩氏女中校规极严,她不能出来,只能由我去看她,所以我们的来往是往而不来的。她的老师是外国人,相当守旧。每当我去看她时,那位外国老师就拿一本书坐在我俩的旁边,等于是监视我们。我们也曾在媒人丁先生家同席吃过几次饭,时间都是礼拜天。双方表面虽

很矜持，但彼此却是心心相印的。那时青年男女要看一场电影、吃吃馆子是绝不可能的事。那位善意监视我们的外国老师，一直等到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才离开我们，允许我们自由。

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我与育英订婚。原拟于六月间结婚，但不幸我突患了伤寒，病得很重。当时我任军职，身体原来很好，不料有一次骑马遇雨，受了凉，就染上伤寒。我与育英虽然已经订过婚，但是恪于教会学校规定，当我住院时，育英仍旧不能前来医院探视。为了这场病，婚期不得不延搁下来。

我们的婚礼迟至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五日才举行。我与育英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所属的教会不同。我是圣公会，她是浸信会。最后，我们决定在她的怀恩堂去举行婚礼。婚礼完全是宗教仪式，一切都由外国牧师安排。那天结婚的礼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来装饰，与众不同，也别具情调。六十几年前用青色来装饰结婚礼堂，恐怕也是创举。因为有这段值得纪念的往事，所以三年前当育英去世时，在追思礼拜中，我也用青色的竹子来布置灵堂。

婚礼举行前，我正代理团长。当时的团长是蒋先生，他因公出差，由我代理。刚好团部有一辆双马驾驶的马车，可以借用当作结婚的礼车。马车在当时算得上最新式的代步工具，车身很漂亮，顶篷可以撑起来。这辆摩登的马车便代替了花轿。我当时的住处是在弄堂底，车伕认为双马车进不去，我认为可以实地研究勘察一下。因为我本

人是学炮兵的，练过马术，能驾马车。于是我就陪同车伕去勘察，结果，我们竟将车子赶进去了。

结婚之后，因国事战乱不安，同时为了彼此的进修，我们决定五年之内不生子女。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婚后五年才出世的。现在，避孕已成为家庭计划的主要部分，大部分人都晓得避孕节育的道理，但在六十多年前我与育英有此共同认识，却是很不寻常的。

民国元年(1912年)，局势很乱。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政府稽勋局(冯自由任局长)选派我赴英留学。那年夏季，正当育英陪我到天津准备束装赴英时，发生了宋教仁被刺的案子，袁世凯窃国阴谋已很明显，我遂中止赴英，参加讨袁。讨袁失败后，我被通缉，乃偕育英亡命日本。我入士官学校，她进长崎活水女子学校，习幼儿师范教育。民国四年，我在士官校毕业后，正是袁世凯当政之时，不能回国，我应友人之邀赴印尼巴达维亚中华学校任教。育英承黄膺白夫妇之助，前往美国考察幼儿教育。民国五年(1916年)返沪，她仍在教会学校任职。我也于是年秋回上海，参加第三次革命。

民国六年(1917年)，护法政府成立。我奉命四方奔走，并两度赴日，使命在身，难顾家室。当时国内战乱频仍，纵有聚首，身心也难得安宁。民国八年(1919年)育英携长子继正返川，其后又迫于战祸，仓皇出走，到处飘零。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军兴，我随政府至武汉再转重庆。二十九年(1940年)再赴成都主持四川省政，育英于

是年夏季送长女赴英留学，并赴德国探视继正。因为欧战一触即发，又携子女一起赴美，然后经港返川。我们的婚后生活真可说是颠沛流离，艰苦倍尝。育英上奉老母，曲尽孝心；下抚子女，竭力教导，生活费用，全赖自筹。此中况味，惟育英知之最深，感之最切。所以她在我们结婚六十周年时曾写一文，总括全文意思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聚少离多”。

育英自十三岁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受洗做了虔诚的基督徒。她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全部与她的信仰相融合，爱国爱人，重于自己。她认为国家与人类的兴亡全取决于上帝的信念。所以她对上帝的虔诚，涵盖了一切。她的信心，不论环境顺逆，始终不渝。她自奉甚俭，而乐于助人，视人之疾苦，有如身受。在伦理方面，能善顺人情，恪遵礼法。结婚八年后始有机会返回我的家乡四川。以孝敬其母之道孝敬翁姑，对长辈的尊重，对子侄的慈爱，使我们张家一门充满了祥和之气。

育英富同情心，能容忍，择善固执，以恒心与毅力追求尽善尽美的人生，追求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所以她能蔑视一切浮名利禄，更能忍受一切忧患和疾苦。她的身体原本比我差，心脏弱，血压高，更因她生性畏烦琐，所以常是足不出户，仅在教义研索、祈祷、修持方面下功夫。自我退休以后，常和她切磋教义，以遣岁月。

她因患有白内障，目力日损。经开刀后结果良好。五十九年(1970年)一月试配眼镜，甚不习惯。三月一日，忽

然跌了一交,伤后在家休养医治。至六十年(1971年)七月,本来已可缓缓走路下楼,但因体虚行动不便,又于六十年(1971年)七月二十五日跌伤头部。自此,即不能行动,在床上躺了三年,完全依靠信仰和医护的力量,勉强支持。至六十三年(1974年)六月二十九日,因为有其他病症并发,病情转剧,入荣民总医院就诊。住院期间,除我之外,子女媳婿轮流侍疾。虽在病痛之际,仍以孝顺勤学之道训诫孙辈。

她的身体不好,但却活了八十六岁。我的岳母也活到八十六岁。她生前常常羡慕母亲的高寿,没想到她也享有同样的高寿。

我们夫妻的感情一直很好,因为彼此互相照顾才都能同享高龄。育英生病三年,相当痛苦。不过她从来不呻吟,不说痛,这也是她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所致。她在病中,若是自己感到不舒服的话,她什么人都不愿意接见。朋友和教会的同事常常来探视她,她只要觉得不是不太舒服的时候,都会见他们,同他们谈谈。因此朋友们看到她时还以为不错,事实上她很好强,谁都不知道她在痛苦挣扎。一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七月六日),她还在祷告主,就在祷告中安静地去世。她的宗教修养对她与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谈 喝 酒

有人说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喝酒有损健康,我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吃酒,很随便,没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时间要从容。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边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你去办。

第六,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吃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情

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

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要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辈子的一点体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这要看情形而定。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要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国元年(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那时候我尚年轻,学校还没有毕业,因此革命完成以后,我们年轻人,像蒋先生、汪精卫和我,都还希望能够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政府组织里面有个稽勋局,冯自由任局长。稽勋局计划选送一批青年同志到国外深造,有三十多人入选,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计划去德国,汪精卫要去法国,我则想去英国。是年十月,我在上海和马育英小姐结婚。婚后不久我就预备到英国去。当时去英国有一条路,一是坐船经新加坡、入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越过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国,这是海路;一是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欧洲,然后过海到英国,这是陆路。我预备走陆路。是年冬天,我夫妇北上到天津,住在黄膺白先生家里,准备出洋。那时膺白先生也准备出洋考察军事。

没想到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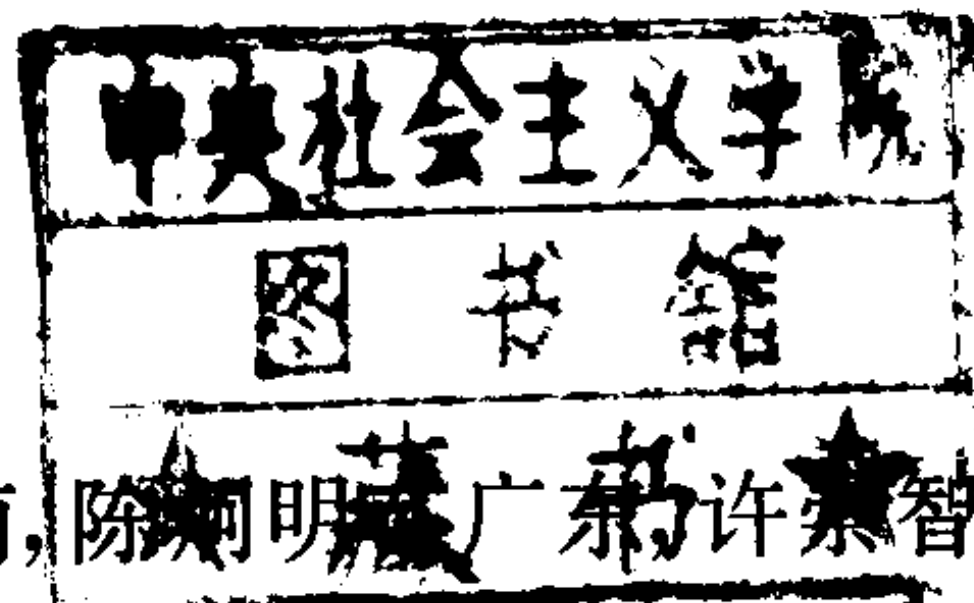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虽然已经继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国会的参众两院则控制在国民党的手中,将来正式选举总统和制定宪法,国民党成为

决定性的力量,而且在南方如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的都督都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不但控制国会,而且掌握一些武力,对袁世凯是一种约束和威胁,因此深遭袁氏之忌。他于是阴谋暗杀国民党的领袖和重要干部。这时有一个人专门做暗杀工作,是一个职业杀手,他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部下,此时却已为北洋军参谋长陈宦(二庵)所收买,教他到蒙古去刺杀德王,没有成功,北洋方面又派他往上海,阴谋有所举动。黄膺白先生得知消息,说此人往上海恐怕对国民党有所不利。那时陈英士先生在上海,膺白先生得到这个消息,恐怕此人将不利于英士先生。适英士先生有电报来,请膺白先生就浙省参议员之职,罢出洋之议。膺白先生复电不以为然,为出洋应该守信,同时正应增加建设学识,并派我到上海,把在北方所见空气以及北洋军阀在上海收买刺客的消息告诉英士先生。我于是就在三月初由津南下,到上海向英士先生报告一切。没想到我向英士先生报告了之后,转往南京下关,预备搭乘津浦路火车北返天津之时,就听到宋教仁(钝初)先生在上海被刺的消息,那时是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二十一日,宋是在前一天晚上遇刺的,腹部中枪,延至二十二日以伤重不治死亡,年仅三十三岁。宋教仁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理事长孙中山先生那时候在日本,宋教仁那时正从湖南沿江而东,经湖北、安徽、南京而到上海,随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主张责任内阁制,因此大遭袁氏之忌,乃幕后主持暗杀的行动。

宋被刺以后，拘捕了行刺犯武士英（本名吴福铭），谋杀犯应桂馨（即应夔丞），并在应宅搜获种种证据，则同谋者尚有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并涉及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将全案证据通电全国，一时舆论沸腾，指袁世凯为杀宋的主谋者。

我在宋案发生的第二天回到天津。当时大家研究，袁世凯的阴谋不法，对国民党很不利。宋教仁之被暗杀，种种迹象显示阴谋主使者是在位的大总统袁世凯，因此国民党人都很忿激，中山先生也从日本回来，主张起兵讨袁。但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都已离职，兵力也不足，因此也有人主张慎重，静待法律解决，所以一时没有行动。不过，上海陈英士先生也促膺白先生和我南归，膺白先生遂中止他去日本考察军事的计划，我出国的计划也就中止了。我们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二次革命就起来了。

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袁世凯违法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但是参议院开会反对大借款案，而湘、赣、皖、粤四省都督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五月，赵秉钧以宋案嫌疑，称病辞职，袁世凯命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五月底，国民党计划讨袁。六月，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都被袁世凯免职。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发表檄文，声讨袁世凯。而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陈英士先生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其他如冷遹独立于徐州，



柏文蔚在安徽，谭延闿在湖南，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熊克武在重庆，这十个国民党籍的督军都宣布独立，起兵讨袁。这一次声势浩大的讨袁之役就叫作“癸丑二次革命”。

国民党虽然起兵讨袁，但是兵力仍嫌单薄，又各自为战，而袁世凯则早有准备，他命第一军军长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率第六师师长李纯所部攻江西，命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应瑞”、“肇和”诸舰抵沪，并任命郑为上海镇守使，任张勋为江北镇守使，沿津浦路进攻讨袁军，又任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后且任倪为安徽都督，与张勋合击徐州，任第二军军长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攻南京。战争进行不到两个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

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是陈英士先生，参谋长是钮永建。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和我都参加了。我那时很年轻，才二十三四岁，任副团长，团长是蒋先生。我们在七月下旬两次进攻制造局，均告败退。不久，各地讨袁军都告失败，南京失守，黄兴、陈英士、蒋、柏文蔚、李书城、钮永建、李烈钧、陈炯明等都亡命日本，膺白先生和我也在八月初被袁世凯出“赏格”通缉后东渡。当时袁世凯出赏格黄兴十万元，陈其美（英士）五万元，黄郛（膺白）、李书城各二万元，“不论生死，一体给赏”。八月十五日，袁世凯以北京总检察厅名义，通缉中山先生及二次革命首要。

二次革命失败，我亡命到日本。这是我第二度到日本，第一次是在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

同学；毕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民国成立以后，我们原打算到欧洲去留学，不打算再回日本。不意二次革命发生，欧洲是去不成了，大家又亡命到日本。幸而我在士官学校的学籍还没有取消，而且驻日公使馆还肯帮忙，于是我就在民国三年（1914年）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第二年毕业，在日本没有事做，又不太安全，于是就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 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 Jakarta）的中华学校教书，在那里暂时避避风头。

袁世凯在击败国民党二次革命的武力反抗之后，大权在握，更加骄横不法，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终身大总统，仍然没有满足他狂妄的野心，竟于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推翻共和，帝制自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在北京即皇帝位，年号“洪宪”，以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四年（191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松坡）、唐继尧、任可澄、戴戡等在昆明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并组护国军讨袁，蔡锷和李烈钧分任护国军第一、二军总司令，进兵四川、广西。他们要维护共和政体，要“为四万万万人争人格”，这一次革命战役就被称为“云南起义”，或者称为“护国之役”，也就是第三次革命。

自蔡松坡等人云南起义后，各地反袁的势力相继兴起，陈英士先生和蒋先生在上海举事，黄膺白先生则在浙江活动，以响应西南讨袁义师。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党人

更是到处活动。其他非国民党人像梁启超也潜赴西南，运动两广，中山先生宣言与各方一致讨袁。只要反对袁世凯，全国人民可说是一致的，因此发挥了极大的力量。袁世凯则众叛亲离，他手下的大将像段祺瑞先就不赞成帝制，冯国璋也很冷淡，而他的心腹龙济光、陈宦、汤芑铭到后来都通电反对，宣告独立。袁世凯眼见举国反对，而他的亲信都靠不住，遂于三月下旬撤消帝制，他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但是他还想恋栈，还想继续做总统，各省仍然继续反对，要他退位，袁世凯终于羞愤成疾，在六月六日病死了。第三次革命的护国之役，在全国的人民支持下，终告成功。我那时也从荷印爪哇回到上海，参加这一次革命的活动。这一年夏天，陈英士先生在上海被刺殉国，蒋先生为之经纪丧葬。革命阵营失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第二年即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从徐州率领他的辫子军入北京，迎逊清宣统皇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通令各省讨贼，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他自己则出公府，避地日本使馆。段祺瑞乃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出兵平定复辟之乱。段遂入京执政，但他不肯恢复国会，破坏民初约法，中山先生乃率领海军南下，一些旧国会的议员同行，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于是南北分裂。第二年，南方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制，选举唐继尧、孙

总理、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唐绍仪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中山先生表示反对，乃离粤赴沪，专事著述，撰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实业计划》等书。八年（1919年），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民国十年（1921年），中山先生返粤，广州军政府废总裁制，改为大总统制，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在广州设立大本营。

当时北方一样混乱。北京政府自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将大总统职务交予副总统冯国璋，即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七年（1918年）九月，北京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是年冬天，南北代表在上海议和，南方代表是唐绍仪，北方代表是朱启钤。国家表面上像是统一了，但内部问题丛生，军阀混战无时无地无之，较大如直皖之战、直奉之战、江浙齐卢之战，以及各省军阀的冲突，大大小小，叙说不完。总之，袁世凯虽然死了，他一手训练培养起来的北洋军阀，贻祸国家，扰攘十数年，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广受破坏，一时还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现在回头来谈谈我的事情。民国五年（1916年）云南起义后，我从南洋爪哇回到上海。袁世凯死了，我就到北京去，黎元洪要我当顾问，后来他又要我办军官学校，我都没有接受。我那时仍然想出国留学，一方面是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另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岁数还轻，其时蒋作宾（雨岩）为陆军参谋总长，我想请他派我去日本进陆军大学，没有成功。一时也没有其他出国留学的机会。

那时候欧战打得正激烈。欧战是 1914 年即民国三年发生的，那时还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代。中国起初没有参战，因为战场在欧洲，与中国相距遥远，两不相涉，但是协约国的英、法、日以及后来的美国，都游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来中国就派了二十万华工到欧陆去，在法国战场上挖掘战壕，构筑工事。民国六年（1917 年），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他想借参战之名，扩充军备，以武力来实行统一，就派他的小舅子吴光新到日本活动，谋求日方的支持，并进行借款，这就是世所称的“西原借款”。西原龟三表面上虽是日方的民间人士，但他奉有寺内内阁的秘密使命，在中国活动，用重利引诱段祺瑞，段祺瑞方企图以武力统一，亟谋财政和军械的支援，不惜以巨大的代价换取日方的支持，因此堕入日本的陷阱里面去。西原借款是一个卖国的大借款，中国在财政、交通、铁路、森林、矿产等等损失了巨大的利权，并且埋下了后来济南惨案和东北事变的种子。我那时正在上海，知道这件事后就起来反对，国民党也反对段的对外借款。当时我曾经代表上海两家报纸，一个《中华新报》，一是《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反对借款案。

我在日本另一活动是拜访日本军人。因为我也是军人，曾在日本的军校念过书，和日本军方一些人相识。我去看田中义一，田中是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职业军人，他那时是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他后来升为大将，以“立宪政友会”的总裁于民国十六年（1927 年 4

月)出任总理大臣,组织政府,极力推展“大陆政策”,对中国侵略,他责难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为“软弱外交”,他继承了明治时代推进侵略大陆政策的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衣钵,为日本军阀之巨擘。他曾上奏天皇说:“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当时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说来好笑,段祺瑞其实是我的老师,我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他是军校的督办,所以在名份我算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的思想和主张不同,我认为他的政策对中国不利,所以我要反对他。田中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加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日本这一套别具用心而冠冕堂皇的说词,令我很生气,我当时就跟田中争论,我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 中国和日本不一样,在日本行的是征兵制,军队属于国家,中国则是军阀割据,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私人,而且军阀的派系又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乱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

我和田中的谈话没有结果,不欢而散。西原借款终于签订,中国损失权利不少。我回国后就在《中华新报》写了篇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开始批评日本。从那以后有一段长时间我没有再去日本。

民国六年(1917年),国父中山先生在广州做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我因为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就到广州去,和蒋先生一起在大元帅府做参军。其后民国七年(1918年),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制,选举七总裁,孙先生反对总裁制,他就离开广东到上海去,广东军政府就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是年八月,我被任命为政务厅的副官长。不久,西南的事情起来,四川的军人争得非常激烈,军政府的参谋总长李烈钧就派我入川去调解川军的内争。

先一年我也曾奉派入川去调解军队的纠纷。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率军进入川湘。我就在这个时候奉派到四川,联络同志,在重庆组织了一个“川事维持会”,以反对北洋军吴光新,因此北洋政府又再通缉我,不过四川的同志像熊克武他们都是支持我的,不会拿办我。吴光新后来在重庆为川军师长熊克武所袭,弃职东下。傅良佐在湖南也打了败仗,退出长沙。段祺瑞也因为在川湘用兵失败,不得已辞职。川事结束之后,我又走贵州经广西回到广东,仍旧做大元帅府的参军。这是我自清末少年时代离开四川出外读书之后第一次回去。

打走了吴光新之后,孙大元帅于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熊、杨两人原都是国民党的同志,但是因为有人挑拨,两人不和,中间有了磨擦。而这时四川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复杂,云南唐

继尧也想伸展他的实力到四川，贵州刘显世也派兵入川，加上吕超、刘存厚、刘湘等新川军与旧川军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我因此又奉派从广东入川，奔走其间，协调川、滇、黔的问题。那时杨森（子惠）还在滇军当参谋长，也协助调解。我在民国九年（1920年）入川协调熊克武和杨庶堪之争，被他们留了下来，做四川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不久，川滇黔的问题又告发生，他们又打了起来，调处失败，也有人反对我，于是我又出川东下到上海。在沪上住了一年多，没有做事情，无甚可述。是时蒋先生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率军转战福建。民国十三年（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先生任校长，我的几个同学如何应钦等都任军校教官，蒋先生来信要我去广东，然而正好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在四川去世，我守丁忧，所以没有去，仍住在上海。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乘第二次直奉战争激烈之时，发动首都革命，黄膺白先生出来组织“摄政内阁”，做了总理。冯曾经招我前往，我没有去。后来我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胡笠僧（景翼）那里，做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的警察厅长。在那一段时间与广东常有联络。不久，民国十四年（1925年），蒋先生要我去广东，我就从河南到广东去了。

我到了广东之后，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第二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就出师北伐，很快地推进到长江，这时日本的问题就起来了。

最近几年许多朋友要我写东西，我曾经考虑了一下，内政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必写，当然这方面的资料都有，演讲稿也有好几本，但是有许多话也不便讲，所以最好不要写。《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写完出版以后，如果我个人要写东西，还是谈谈中日关系。因为中日关系一直是民国以来最重要的外交问题，而我自从在国民政府做事以后，也亲自参预了许多中日交涉的问题，亲身体会，感受深刻，也许能有所补充。但是中日问题是很复杂的，时间也最久，一时又从哪里谈起呢？现在仍按年代顺序稍为提示一下。

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军到了长江以后，中日关系的问题就来了，北伐能否成功，中日关系是非常之重要，日本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十六年(1927年)八月因宁汉分裂，蒋先生下野，不久就到日本去考察军事外交，研究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告以中日两国相处之道。这一次就是我以翻译官的身份陪他去的，当时，我与田中认识，蒋先生则是和他初次见面。但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他好从中渔利，当时蒋先生就已断定田中没有诚意。日本希望革命军只到长江为止，不要继续北进。后来革命军进入山东，惟恐日本出兵阻挠，我又奉派前往日本，负起和日本政府交涉的任务。当时我料到田中义一根本不会有诚意，所以我活动有私交的日本朋友，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不要干涉，并由我们出钱，将在济

南的日军撤退到青岛。但是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驻兵济南，蓄意挑衅，终于造成济南五三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最近党史会请我去演讲，我就讲了这一段。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二十年(1931年)，这时我在上海做市长。二十年(1931年)九月，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第二年，又制造了伪满洲国，上海也发生战事，日本人在北方平津一带更是自由活动，到处挑衅，蛮不讲理，步步进逼，中日关系那时候真是非常紧张。那时候是汪精卫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我则在武昌做湖北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这一来行政院非改组不可了。政府改组，由蒋委员长兼行政院长，其中各部会的首长如：内政蒋作宾(雨岩)，外交张群，军政何应钦，实业吴鼎昌(达铨)，铁道张嘉璈(公权)，这六人都曾在日本读过书，跟日本有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就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外面有日本的侵逼，内部的情形又怎样呢？北伐完成之后，国家表面上算是统一了，其实各地方的势力依然存在，时有纷争，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西南的云贵、两广、四川，并不完全服从中央，时有异动，这段时间里有过中原大战，两广还另外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和中央对抗，以

及闽变、西南独立等等，其他像新疆、西藏、蒙古，那更是鞭长莫及。不过，当时国内最重要的还是对共产党进行围剿的问题，经过五次围剿，已经攻破了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日本却在这个时候对我步步进逼，中共又到处鼓动学潮，学生请愿抗日。所以必须先缓和对日的关系，减轻压力，才能有力量从事内部的建设，做安内攘外的工作。我们也知道日本军阀少壮派分子得势，气焰更是嚣张，更是蛮横不讲理，谁也控制不住。但是敌强我弱，中日强弱之势太过悬殊，而且我国内部问题太多，太复杂，真是千头万绪。蒋先生是深知日本的。所以我们才那么苦心孤诣，委曲求全，就是希望争取一点时间。行政院这次改组就是为此。

我做了十三个月外交部长，经过三个日本大使，谈判折冲，希望能改善中日的紧张关系，缓和一触即发的情势，这是十分艰苦的工作。日本往往是得寸进尺，横生枝节，咄咄逼人，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和二十六年（1937年），和日本的关系差不多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了，最后是日本来了一个经济访问团，我们也派去一个经济访问团，这是在抗战前中日两国最后的一次来往了。而在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发生西安事变，全国上下一致拥蒋抗日，日本看到中国即将真正的统一，他的侵逼更加紧了，中国已经到忍无可忍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被逼到只有竭力抵抗的一条路，二十六年（1936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不能不奋起抗战了。

抗战期间,我已离开外交部,负责内政和党里面的工作。先是做党里面的政策委员会的秘书长,国防会议秘书长,以后是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四川行辕主任和省主席。这一些内政上的事就可以不必讲了。

总之,我在清末民初青年时期到日本读书学习军事,就跟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民国六年(1917年)到日本和田中义一见面,反对段祺瑞的参战借款,这是我头一次参与中日问题的交涉,结果没有成功,我回国在《中华新报》写了一篇《中日问题的疑云》批评日本。以后我即跟日本有往来,在北伐期间蒋先生下野,我陪他到日本会见田中。其后有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伪满、塘沽协定等等,都是在我做外长前中日间的重大交涉。二十四年(1935年)冬我从湖北被调到南京做外交部长,主持对日交涉,把我这个内政方面的地方官,调到外交战线上,政府当然有特殊的考虑,有用我之处。抗战之后,我们退到台湾,为中日的问题,我又去了日本许多次,办了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如果要写东西,则对日问题是重要的素材,有许多事情可以写,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的一章。

任外交部长的回忆

在我从事公职六十多年的漫长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内政和军事方面的工作。不过因为时局的特殊需要，我也曾做过一任外交部长，时间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二十五日，共计在职一年两个月又十天。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非常紧张和极为棘手的中日关系，虽然在职只有一年多，却先后跟三任日本驻华大使办过交涉。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形。当年日本对我国野心勃勃，进逼不已，蓄意寻衅，咄咄逼人，而我国则“内战”未已，国力未充，不能不委曲求全，尽量使中日关系不致破裂到不可收拾，以争取准备的时间，个中的艰难辛酸与微妙，我身历其境，首当其冲，恰似“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现在就把我做外交部长这段经历和当时中日间的重要交涉，简单扼要地谈一谈。

我一向是从事内政工作的人，为什么政府忽然要我来做外交部长呢？找我来做外交部长有什么作用呢？这其中有些缘故，需要把当时国内外的情势先讲一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了

我们东北三省。次年正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争，制造一·二八事变，我国强力抵抗，打了三个月，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停战之前，日本的特务已经把在天津的逊清废帝溥仪，就是宣统皇帝，挟持到了东北，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的傀儡组织。到了二十二年（1933年），日军又攻陷了山海关，占领了热河，逼近长城，平津震动。经我军在长城各口浴血苦战，暂时的阻扼日军的攻势，这时蒋先生就挽请黄膺白先生出来收拾危局，北上主持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和日方签订了一个塘沽停战协定，平津暂安。但是，日本军阀得寸进尺，不遵守任何停战协定，经常借口制造事端。日本既已窃据东北三省和热河，制造了伪满洲国，为推进其大陆政策，侵略锋芒就指向华北和内蒙，极力地挑拨华北特殊化，威胁华北自治，脱离中央，并声言他们在华北有特殊的经济权益和政治地位，在内蒙则阴谋制造所谓“大元帝国”，在华北则制造了殷汝耕的冀东伪组织。总之，日本当时在华北，已经是采取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驻军越来越多，随时举行演习，坦克车在北平城内横冲直撞，并强迫收购土地，建筑飞机场，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任意逮捕中国官民，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真是蛮横嚣张极了！

在日本这样的侵略威胁之下，我们中国又怎样呢？为什么不起来奋力抵抗？实在是当时情势不许可，虽然大家都很愤慨，但是秉持国政的人不能意气用事，以国家

民族作孤注一掷，必须忍辱负重，争取准备的时间，所以蒋先生当时的政策，先安内后攘外，而安内攘外又是谈何容易！我们中国积弱太久了，不仅产业落后，还受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连年战乱，无一刻安宁的日子，建设几乎无从谈起。好不容易北伐统一，而外患旋生，日本对我进逼无已，不旋踵东北沦陷，并进而威胁华北，长蛇封豕，企图征服中国。内部还不能安定。除了围剿中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外，当时还有两广的异动，就是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一度不服从中央，几乎演成兵戎相见。此外，四川、云南都有不少问题，再者新疆、西藏更是鞭长莫及，真是国事如麻，困难重重，更何况敌人近在身旁，伺机进逼，百般阻挠，破坏我们的安内工作，不容许我们争取准备的时间。当时局势之艰危，真正是内忧外患，交相煎逼！

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汪并兼任外交部长。他的对日外交政策，是不跟日本直接交涉，而诉之于国际联盟。但是这时候中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国际联盟又软弱无力，只能对日本做口头的谴责，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后来日本竟恼羞成怒，退出了国联。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民党就准备召开五中全会，商讨如何解决当前的国内外问题。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刺客是南京晨光通信社记者孙凤鸣。这一枪使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于是在五中全会之后召开一中全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就整个改

组了。

改组后的行政院长由蒋先生兼任(蒋那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同时是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内政是蒋作宾(雨岩),外交是我,军政何应钦(敬之),实业(就是经济部)吴鼎昌(达诠),铁道张嘉璈(公权)。上自蒋先生和我这六个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与日本有些因缘,明了日本的政情。蒋先生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就是因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无法加以阻止和制裁,唯有利用我们各人的关系,设法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势,直接与日本办交涉,调整中日关系,甚至希望与日本暂时取得妥协,因为我们安内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能再争取这两三年的时间完成安内,即可进行攘外了。当时有些人,以为我们是亲日派,而我们为国任谤,也从未加以解释。蒋先生于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作外交报告,讲述外交方针,认为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而“道义”二字,是解决中日两国现在难局之根本原则”。且当时中国“应以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为绝对的坚决的共同信条,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又说:“吾人今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略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

作。否则当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质言之，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原来在湖北做省政府主席，这次政府改组，被调到中央来做外交部长，就是希望利用我的一点关系，和日本人办交涉，能稍为缓和中日间紧张情势。我在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十六日就任外交部长；十八日，我即对外发表外交方针，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以合法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并发表谈话说：“国际间之互信，实为国际间最坚实之基础；而国际间之互信又赖乎各国之执政者互见以诚。”

我就任之后，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外交情形，异常困难，过去希望国联帮助，我们失望了，又希望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地寻求出路，我们也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才觉悟到不得不反求诸己，埋头苦干安内攘外，以求自力更生。而日本这个时候，又起了二重外交政策，一方面用武力来压迫我们，一方面又高唱调整邦交。因此感到我们的应付方略，不能不有具体的改变，所谓具体的改变，就是不理枝枝节节的交

涉，不采取地方交涉办法，凡两国外交事件，概由两国外交官用外交方式办理。我并通知地方当局，把所有外交事件，都推到中央来办。这是对于交涉方式的主张。在两国关系上，也有一种具体的主张，就是中日两国的关系，要有一个整体的调整，不能今天谈这个问题，明天又是那个问题，支离错综一无准绳。中日两国应站在东亚和平基础之上，彼此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根本寻求一个共同可行的方案。因此日本驻华大使也就变成了我交涉的对手。

我做外交部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又两个半月，却经历了三个日本驻华大使。第一个是有吉明，他也是日本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以前中日之间外交使节为公使级，到了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中日双方协议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有吉明六月中来华，这时成为我第一个交涉对手。（我国第一任驻日大使是蒋作宾，他调为内政部长后，政府改派许世英（静仁）为驻日大使，直到抗战爆发，才下旗回国。）

我发表外交方针的谈话以后，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有了反应，表示同意我昨日的谈话。惟不容撤消不平等条约，须待中国先行完成国内组织。而在两个多月前（十月七日），日本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约晤中国大使蒋作宾，向中国方面提出“广田三原则”，其要点如次：

1. 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如仍旧阳与日亲、阴结欧美与日仇，则绝无亲善之可能。

2. 中、日、“满”关系须常保持圆满，始为中日亲善之根本前提，欲达此目的先须中日实行亲善。在日本方面，中国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方认中国确有诚意。唯在中国方面，或有种种关系有其不能即时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应找出办法——第一、使“满洲国”及与“满洲国”接近的华北地区不起争端。第二、使“满洲国”及与“满洲国”接近的华北地区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络。

3. 中国为防止赤化，须与日本共商一有效方法。赤化运动发源于某国，故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

这个“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政府决定对中国邦交的“调整原则”，成为以后中日外交争议的焦点。最初是一个外交秘密，后来广田在二十五年（1936年）元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众院演说外交政策时才公开出来，而那时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正在华北积极地搞“自治运动”，图使华北脱离中央，所以我一上来就跟有吉明谈华北问题。

十二月二十日，有吉大使到外交部来拜访我，我即与他作我就任外长以来的第一次会谈。我说，年来中日问题未能圆满解决，究其原因，遇事辄为一时敷衍之解决，未作根本之打算。日方未能认识我方之诚意，我则感觉日方要求无厌，如不进行两国关系根本的调整，前途殊堪忧虑。我当即向有吉大使表示两点意见：

1. 本人愿以最大努力, 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 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

2. 用何种方式进行商谈, 亦愿交换意见。

有吉大使表示在原则上理论上赞成整个调整, 但虑华北纠纷如不从速解决恐无法进行。他又提到“广田三原则”, 说蒋先生已在上月二十日会谈时表示无条件赞同, 问我意见如何。我当即郑重告诉他说: “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 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 无从提出对案, 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 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 以便商谈之意。”再谈到华北问题, 我说: “究竟日方对华北之希望如何, 可尽量说出。华北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 一切问题仍须中央整个商谈, 不能除外。”有吉大使仍表示希望华北问题归华北地方处理, 且问我对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意见。我说原则是日方所提, 当然具体办法亦应由日方提示。总之我方希望中日问题有一根本整个解决之办法。有吉说中日问题求一根本解决, 事实上非常困难, 更问我方是否有具体方案。我就说: “目的若同, 纵意见相差甚远, 亦可由讨论而求接近。”有吉大使允为转报政府。我即表示希望日方停止一切在华北之策动, 免发生不良影响。有吉说希望授冀察政委会以较大权限, 我对此再三予以解释。

二月四日, 我政府任命许世英为驻日大使。七日, 日本调回主张缓进的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有田这人我认识, 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前

我到日本，他是外务省东亚局的局长，和他有过接触。所以我很希望他来了之后能好好的谈一谈，使中日关系谈出一个结果来，即使在南京谈不拢，我到东京去谈也可以。哪知有田八郎在二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发动军变，许多元老政治领袖被杀，日本军部的势力更大了，几乎控制了整个日本政府。

有田八郎于三月初旬到南京呈递国书，三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我一共和他举行四次会谈，交换意见。这几次谈话事前经约定双方系依友谊的、非正式的、不作结论的谈话。

第一次是在十六日下午三时到六时，历时三小时。对中日外交关系交换意见，我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不同意，说尚非其时，于是我就说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一次谈话没有结果。第二天即十七日下午二时半又作第二次会谈。有田又提广田三原则，我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中日关系之基础，并说明中国的立场和见解。第三次会谈是在十八日下午二时半，有田说明调整中日关系之希望，及日本之立场与见解。十九日下午二时半，我跟有田作最后一次会谈，彼此披陈最低限度意见，并发表共同声明，大意说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但有此机会，畅聆彼此的见解，于将来调整中日关系之交涉，不无裨益。

在我与有田三月十九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我曾致书

黄膺白(鄂)先生征询意见,旋得膺白先生复书,有云:

“中日两国欲求表里合一之亲善,实非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不可。然体察年来两国内情,此问题一时实无法解决。故兄(膺白先生自称)于前年(1934年)冬,即命(殷)桐生姑先与对方为废除塘(沽)协(定)之运动,不料办未及半,即遭反对,遂尔中止。嗣后北局日非一日,今则对方认华北已为彼之特殊势力区域,既成事实范围,任何政治家外交官,均不敢越此限界。吾弟适于此时身当其冲,困难可想而知。他人或不知,兄过来人,此中滋味,真俗语所谓‘寒天吃冰水,点点滴滴在心头’,终其身而未能忘也。”

黄膺白先生旁观者清,而且他又是过来人,他这封信把当时中日关系问题的症结与交涉的困难,说得非常清楚。他这封信给我很大的影响。

是时日本内阁改组,有田将出任外相。他乃于二十日晋谒蒋先生辞行,未再提及中日问题,惟郑重声明两国亟谋恢复外交常轨之必要。

我跟有田会谈后,三月二十四日,日本广田新内阁正式成立,即发表有田为外务大臣。他已于二十二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出席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听取驻粤、闽、京、沪各地总领事报告。会后取道天津、东北返国,在天津出席日本驻华北各地总领事会议,讨论对华北的外交方针。他并和驻津日军司令多田骏、新任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会商,将来对华外交,除南京外,更以华北及西南等地方

政权为对象，支助其发展，以分化中国，各个击破。华北指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南则是指两广。

有田在中国任职不足一个月，而我和他经过这四次会谈，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实质上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

有田八郎返国之后，因为日本大使虚悬，中日双方的直接交涉暂时停顿。到了四月十七日，日本以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征求同意。川越于六月下旬来华，二十二日抵达上海，到七月三日才向林主席呈递国书。这是第三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我跟他一共作了八次会谈，以下是会谈的约略经过。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中，日方已决定强化华北驻军，日本在天津驻屯军从两千多人骤增到八千多人，北平隐然已在控制之下。此事经我外交部一再交涉，均无结果。同时，在日军掩护下的浪人走私和贩毒的问题，这时也猖獗到了极点，我外交部于五月十五日向日外务省提出第六次严重抗议，日方也延不答复。这时我国发生两广异动的事件，日方对华北之侵略虽然还是继续进行，而对中日两国的整个国交，则采取静观变化的态度。到七月底，广东事变顺利解决，全国统一的局面告成。这很出乎日方的意料之外，因此，日方对华政策一时大起争论，而

不幸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于是就开始了我与川越的一连串会谈。

首先要说明“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的经过。

“成都事件”是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有两位日本的新闻记者，被愤怒的群众殴击身死，另有日侨两人受伤的流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日本未得中国同意，便拟派遣总领事进驻成都。中国以成都非通商口岸，拒绝日本派遣领事之请，日本则以成都那时是剿共的军事中心，极具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性，所以日本想设立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乃于是年五月在未得我政府的同意之下，任命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岩井于七月底来华，抵上海，旋即搭乘长江轮船西上，在八月中抵达重庆。但是岩井强行赴任的消息经报纸报导后，成都民众大为激愤，抗议运动为之激化，岩井乃留在重庆日本总领事馆。

但是，随同岩井到来的大阪“每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员渡边洸三郎、上海“每日新闻”记者深川经二、南满铁路上海事务员田中武夫、汉口濑户洋行老板濑户尚等四人则走在岩井的前面，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住在大川饭店。当天成都万人大集会，抗议日本要强行在成都设置总领事大游行，这四个日本人的到来，更加激增了反日的情绪。

成都的治安当局唯恐发生意外，乃加强采取防制措施，派了便衣警察十多人，劝告这四位日本人不要走出旅馆，但是他们不听，第二天却去游览名胜，出外购物，到处

游历。是日(二十四日)傍晚,激愤的民众陆续集中到大川饭店门前,警方也加意戒备。但是,来势汹汹的群众,终于进入饭店捣毁家具,那四个日本人也抡起棍棒来应战,终因众寡不敌,渡边、深川两个记者被群众打死,田中、濑户两人受伤,被警察奋力救了出来。军警方面出动镇压,颇有死伤,并处决为首的人。这就是“成都事件”。日本便以这个事件来造成外交问题。

事变一发生,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立刻来找我交涉,表示:“我方的要求,俟调查实情之后再行提出,关于本案,中国方面责任重大。”其实,事变一发生,我立即派外交部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飞往成都,实地调查,以凭核办。

二十九日,行政院更发布明令,重申我政府敦睦邻谊之意。原令谓:

“查我国人民,对于友邦,须敦睦邻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早经明令饬遵在案。最近四川成都,竟因人民暴乱,发生殴击外人事件,殊违政府睦邻之旨。除饬主管机关迅速妥为处理外,兹特重申前令,仰各切实遵守,毋得违背,此令!”

然而这个不幸事件却给日本造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日本外务省跟陆海军的首脑已经决定提出下列的新要求:

1. 使承认“广田三原则”,并促进实际的经济提携。
2. 使完全接受“华北明朗化”的计划,并强迫具体实

施。

3. 要求开放长江上游航路, 以及承认日本人在沿岸内地侨居、贸易、购买土地、设立工厂之自由。

这完全是跟“成都事件”无关的要求, 不过是日本人借题要挟而已。在这里, 对于日本之所谓实际的“经济提携”, 须得略加诠释。当时日本已经在大藏省(即财政部)设立了“东亚经济调查课”, 同时“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也在天津设置“事务所”, 驻屯天津的日本军部也设有“经济顾问部”——布置了若干“经济提携”的据点。而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更是一个积极的经济提携者。经济提携的目标, 是要中国成为棉花、煤铁、羊毛等原料的“供应国”, 日本则为工业制品的“供应国”, 也就是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他的第二项要求, “华北明朗化”的语汇, 也就是要在华北树立傀儡组织的另一说法。

第三项的要求则在中国的中、南部培植日本势力的企图。

日本方面乃根据这个决议, 训令川越茂进行交涉:

1.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根绝排日政策。

2. 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表示道歉, 并处分负责人暨犯人, 以及对被害者给予赔偿。

3. 国民政府负责排除重新开设日本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切障碍。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正在这次会谈之前, 又在广东

钦州发生日本人被杀害的“北海事件”。

九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在广东钦州北海的珠海中路，群众发生反日示威，有一凶汉闯入家日本人经营的“丸一药房”，将店主中野顺三杀害，造成所谓“北海事件”。

北海事件与成都事件不同，它是地方势力制造出来的问题。钦州这时是蔡廷锴的第七军翁照垣部的防地。第七军就是原来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和翁照垣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的抗日名将，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不久闹了一回“闽变”，闽变后，十九路军的番号取消，改称第七军，隶属桂系。但这时两广异动，桂系的李、白正和中央对峙。翁部于此时击毙日商，企图引起交涉，增加政府的困难，减缓中央对广西所施加的压力。

北海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即刻于九月九日自上海派遣军舰两艘，十日又从青岛派舰四艘，分别向广东海面开动。

这就是我和川越大使开始进行会谈的背景。

川越大使奉东京训令，就成都事件与外交当局交涉。他于九月十三日从上海来到南京，十五日，我跟他举行第一次会谈。我方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中日关系问题混为一谈，但是日方则以成都事件不难解决，若仅解决成都事件，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当局即提出四项要求：

1. 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

2. 修改教科书, 删除排日思想;
3. 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自治;
4. 中日经济合作。

这四项要求自非我国所能接受, 而且与成都事件毫不相干, 会谈无结果而散。

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 我跟川越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时候北海事件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 所以在这次会谈时, 川越即以调查北海事件为借口, 用胁迫的语气表示: “日本海军考虑对于海南岛或青岛作保护占领。”北海事件发生在广东钦州, 与海南岛和青岛风马牛不相及, 而日本大使竟作此威胁, 借题生事, 蛮横无理, 实令人气愤。当年与日本人办交涉,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深感个中的苦恼。而且在当时会谈的时候, 日本海军已向广东方面派遣舰队, 故而双方会谈是在紧张气氛中进行。

在交涉刚刚开始不久, 中日关系又呈紧张, 发生丰台事件和汉口事件。在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纪念日, 是日傍晚, 丰台日军演习, 借故挑衅, 与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某团第五连发生冲突, 当时中日两军迎面碰上, 互不让路, 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驰入我军行列, 日军并遂即散开将我军包围, 我军连长孙香亭挺身趋前, 想要制止冲突, 竟被日军掳去, 双方相持竟夜, 北平戒严。这是丰台的中日军队在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冲突后的又一次冲突, 也是七月九日大沽冲突、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冲突以后双方最大的一次火并。到了十九日双方避免

冲突,我军撤退。反而是日却又发生汉口事件。

所谓汉口事件,是汉口日本领事馆巡查吉冈庭二郎不知被何人以手枪射杀于日本租界的日信码头。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租界,既不是中国警力所能及,中国也无法调查,而且吉冈被射中的枪弹,是发自最小口径的白朗宁手枪,这种手枪中国一向没有输入,凶手是否中国人,尚属疑问。但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借口保护侨民,以两艘驱逐舰载送陆战队员数百人在汉口登陆,并随便指称中国人有嫌疑,被逮捕者二十三人之多。

这件事使人联想到两年前(1934年)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的失踪案。藏本奉命制造事件,以作为侵华的借口,这是日本人的一条苦肉计,至到真相大白,贻笑天下。而这个汉口事件,也很有可能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借以嫁祸我方,再提出种种要挟。就算是吉冈之死不是日人的特意,也只是小事一宗,但是东京方面,却特意小题大做,外务省与陆海军的首脑连日会商,每次都是强硬派占优势。二十一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申言:成都、北海和汉口的不幸事件“为易于燃烧气体之排日主义的结果,日本在政治方面自当更坚决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取缔排日主义,调整两国关系”。局势发展得非常紧张,于是我也就面临日本提出强硬的要求,和川越进行艰苦的交涉。

九月二十三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川越即席强硬提出极严苛的七项要求:

1. 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惟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2. 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

3. 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4. 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

5. 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

6. 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

7.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以及取缔朝鲜人的问题，并要求严格限制朝鲜人归化和参加军事学校等。

像这样苛刻无理的要求，视中国为日本的附庸，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当然不能接受，任何国家也都无法接受。然而日本居然要求即时一并解决，“以表示中国方面之诚意”！

我向川越大使指出日本的提案皆属无理要求，断然地加以拒绝，并向他尽量阐述我国的立场，对于日方提出的问题，分别说明我方的见解，其要点约略如下：

1. 华北问题 中国北部无问题，惟因年来日方造成之种种特殊状态，遂有所谓华北问题。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经济合作，而在华北之政治及财政方面，甚

至欲造成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权，则此种计划，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商讨之余地。

2. 减低入口税问题 入口税之改订，为我国内政上之事。政府所订关税，本可斟酌国家财政状态与商业情形，随时为适宜之调整，惟在研究关税之调整时，所有走私现状，自应首先予以考虑。

3. 共同防共问题 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待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且数载以来，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围剿，目下共党残余无多，不足为患。中国政府始终恃自力应付，毋庸外国之协助。

4. 上海福冈间中日民用航空联络问题 此事日方提议，原在九·一八以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递信省曾与我交通部数度商议，本平等互惠之精神，拟有草约。嗣以日本飞机在我国各地，未经合法手续，任意飞行，影响我国领空主权甚大。我方认为在此种事态未终止以前，碍难实行沪福联航。

5. 聘用日籍顾问问题 中国政府聘用外国顾问，应视政府需要与被聘人员之技能而定，初无国籍之分。中日邦交果已好转，中国自动酌聘日籍技术人员为专家，非不可行，但决非可由外国政府要求之事。

6. 取缔排日问题 在中国方面凡政府力之所及，原可引导人民对日观感，借以增进中日人民之关系。惟情感发于自然，出自环境，为本清源计，日方应一面消极地除去恶感，一面积极地树立新国交。消极方面，应即停止

在华种种策动, 废弃武力干涉与高压态度。积极方面, 须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行政统一之诚意, 否则政府虽日发一令, 仍不能改变人民心理。

7. 取缔朝鲜人问题 关于取缔朝鲜人之非法行动, 中国政府固不愿任何外国人在我领土内有何非法行为; 惟同时朝鲜人、台湾人及其他日本国籍人民, 在日本势力庇护之下为非法行为者, 日方当局, 自亦应加取缔。

我拒绝了川越大使所提的无理要求并对其要求说明了我国的立场之后, 我同时又再强调我方认为中日关系之调整, 应合乎平等及互尊领土与主权完整之原则, 若仅就有利于一方之问题进行商讨, 是不得谓为国交之调整。因将我方认为最迫切之问题, 提请日方切实答复, 迅予解决, 我乃即席向川越提出对案如下:

1. 废止淞沪、塘沽停战协定。
2. 取消冀东伪组织(殷汝耕)。
3. 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
4. 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5. 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蒙古德王及李守信部队)。

我并且表示: “我所提出的五项, 是目前两国纠纷的症结所在, 若不能解决, 则中日邦交无从调整。”

川越对于我提出的五项对案, 根本拒绝讨论, 而强行要求采纳日方的提案, 因为日本认为, 如果用武力胁迫, 则无论怎样蛮不讲理, 都可以行得通。于是谈判濒于决裂的边缘。

我立刻把这一次和川越会谈的详情，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往广州，向蒋先生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那时蒋先生正在广州处理广西问题，劝服李宗仁、白崇禧归顺中央，对于川越提出的这几项要求，我认为上海和福冈间的通航，不妨可以接受，但是蒋先生认为日本方面志不在此，徒让无益，遂未予接受。蒋在广州并且打一个电报给我，要我读一读《郑子产传》，这是当时新出版的一本书。小不忍则乱大谋，当时中日之间情势之微妙，负责对日关系的人，如果稍为沉不住气，往往容易僨事，使中日关系完全走上决裂的道路。这对中国没有好处，中日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能轻易言战，以国族生命为儿戏！我不是一个易于冲动的人，国脉如丝，不绝若线，我也很了然我国危险的处境，但在跟日本人办交涉，在日人不断地步步进逼，蛮不讲理地压逼之下，我亲历其境，首当其冲，也几乎动了肝火。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仅是左右时局难，就是想要委曲求全，也很不容易咧！

此时，外交部并将会谈情形电告正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我国代表，旋即得代表团顾维钧、郭泰祺、金问泗、钱泰和梁龙五大使联名致电外交部，说：

“近日日本借口事故，对于沪、汉、粤南、丰台，或遣舰增防，或派兵占领，仍欲出最后手段，使我全国屈服。而川越提出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果然坚持包括中国全部，其范围超越二十一条之要求，真是日本亡朝鲜故技。钧等

于役海外，不胜焦虑。”

顾维钧大使并在国联大会以中国代表身份发表演说，呼吁注视远东局势，同时提出警告说：“日本野心如不戢止，将会有重大影响及于欧洲。”但是那时国际间绥靖主义弥漫，侵略凶锋方兴未艾，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正以武力侵入非洲古老的阿比西尼亚王国（今埃塞俄比亚），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崛起，开始以行动破坏凡尔赛和约，欧洲正在酝酿风暴，列强自顾尚且不暇，当然无力东顾，这也是日本在中国完全不受牵制，能够自由行动的一个原因，所以顾维钧大使在国联大会的演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未能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国联既未能对日本已往的侵略给以制裁，也无法限制日本今后的行动，日本人也完全看透国联的真面目，知道国联无能为力，就更横行无忌了。

“无巧不成书”，这是中国旧章回小说的一句老话，但在我出任外长，和日本大使办交涉的时候，在会谈的当儿，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中日冲突的事故，节外生枝，益增加交涉的困难。在抗战前中日间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不知凡几，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而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军部和特务机关所蓄意挑衅制造的，从战后所公布的日本档案及所出版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像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高桥坦、河本大作、田中隆吉等等这些日本军头和特务首脑的非法活动，他们制造这一连串的流血惨剧，企图挑起中日冲突，

作为侵华的借口，以遂行其大陆政策，达到在中国扩张势力，实现其所谓“八肱一字”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前举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的失踪案，便是一个例子。

在我和川越大使举行第三次会谈的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上海又发生了日本水兵被枪杀的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的水兵，在上海公共租界吴淞路口，突被枪击，其中一等水兵田港朝光胸部中枪，当场死亡，另有两人负伤。于是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即刻出动装甲车，封锁闸北交通，岗哨的枪都装上刺刀，对行人一一检查，凡是认为可疑的人，都不问青红皂白，滥事拘留，一时空气大为紧张。

日本海军省(部)接到上海事件的报告，当天彻夜开会，决定采取强硬的政策，以武力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威迫外交”，据战后公布的日本资料，当时日本海军省所决定的“对支(中国)时局处理方针”，主要的内容是：

“以武力为后盾，要求和蒋介石直接交涉，促其返回南京和日本直接交涉。如果不回南京，则发出最后通牒，并将日本侨民撤往上海、台湾、青岛等地。至此，如不接受要求，便与陆军协力对青岛作保护占领，并封锁中国中南部要地，以及轰炸其航空基地暨军事设施。”

于是就在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之间，日本海军调集了巡洋舰五艘、驱逐舰二十四艘、炮舰十艘、特务舰二艘于上海，并派遣陆战队两千多人登陆，进入备战状态。

日本内阁会议于二十八日接受了海军的要求。会后，外相有田八郎会见各国记者团，发表谈话，表示“调整日中两国国交的交涉毫无进展”，他以一种恐吓式的语调说：

“此次日本与中国交涉之结果，于中日关系非常好转抑非常恶化，二者必居其一；若从来之暧昧情形，决非所许。”

他并且以一种指出责任就好像在中国方面的口吻表示：

“此际，中国与日本携手乎？否乎？实已立于应择其一之重大歧途。在余个人，仍希望中国排除万难而与我方握手。”

而日本海军方面的态度，尤见蛮横，竟然说：“中日南京的谈判，已无进行的必要，而当断然的发动实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我跟川越的会谈，遂不得不暂行停顿。

就在九月二十八日，日方向我国提出要求，希望川越大使能与行政院长蒋先生“直接交涉”。日本政府并派遣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来华，向川越传达新训令。这事依照国际惯例，实属无理，未之前有。但是我国为表示调整两国关系之诚意，并希望能打破眼前交涉的困境，延缓日本的进攻，蒋先生仍然答应和日本作直接交涉，而于十月八日上午十时在南京的行政院长官邸接见日本大使川越茂，会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有关中日两国前途及亚洲大局的情势，蒋先生对川越大使作了透彻的说明，并向他严

正表示，要求日本尊重我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蒋先生剴切说明：

“就东亚大局着眼，两国国交之根本调整，在今日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则国交之调整必可有圆满之结果。”

继之，蒋先生并对在各地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

“此等事件，虽因有些地区中国政府不能行使警察权，未便一概而论，但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此等不幸事件，则不能不引为憾事。对于业经调查之成都与北海事件，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

关于其他外交问题，仍应由外交部张部长与贵大使继续商讨。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

会谈结束，川越告辞退出，临别之际，蒋先生更郑重提到：“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会后，蒋委员长又应中央社记者之请，发表感想，并表明希望透过交涉解决问题之意如下：

“双方谈话精神，完全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川越大使之精诚与态度，其诚挚坦白实足欣佩，并完全本于广田首相去年在彼国会议中发表之方针——即在“不威胁、不侵略”之原则下，力谋调整国交之实现是也。

以今日川越大使所表现之精神推而言之，则中日两

国间问题，皆可不采外交正当途径以外之方式，而依外交常轨以平等基础解决一切困难，一扫过去之纠纷与黯淡之阴霾。

盖人类本富于感情，惟有精诚可以感召一切。如一方果能以精诚相示，则彼方必有以精诚相应之一日。深信余之抱负与期望，不难贯彻始终也。”

川越也发表谈话，他说：“交涉前途固然非常困难，但并非绝望，仍在继续折冲。”日本外务省并表明：“至少目前决裂之危机可以避免，现在已有打破继续谈判难关之希望。”

会谈的困难既已排除，于是我与川越就在十月十九日举行第四次的会谈。二十一日，又作第五次会谈。这两次的会谈都没有结果，双方的意见仍然不能一致，日本方面提出的仍然是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取缔排日思想等条件；争论的焦点是华北自治与共同防共两事。二十三日，我接见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指出：“现在日方表面上在南京交涉，而关东军在绥东侵略，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之诚意！”喜多询问：“南京上海间、上海杭州间，传有大军配备？”我回答说：“所传未免神经过敏。有一点部队，都是两广事件后返防的。”喜多告辞而去。

因为这两次谈判没有结果，于是川越就派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回国请训。我也电令许世英访晤日本有田八郎，主张缓谈华北自治与共同防共问题，以打开中日交涉的僵局。

十月二十六日，我跟川越作第六次会谈，仍无结果。

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阁议通过对川越的新训令：“华北自治及共同防共须中国先为原则的承认。”

第二天，蒋先生发表谈话说，对日交涉守必要限度，即恢复河北行政完整，取缔察北匪军（王英及李守信），至剿共方针决定贯彻。我即于是日命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访晤川越大使。川越表示中国提案与日本要求距离甚远，交涉不易进展。谈判又告停顿。

外交会谈既无进展，在华北的日本驻军于是自由行动，犹如脱羈之马，全然不受约束，其意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并造成既成事实。平津和通州的日军，举行大演习，目无中国主权，经入北平城，北平各大学停课一小时，表示哀痛。而日本关东军又师制造伪满的故智，阴谋策动内蒙自治，暗中支助察北匪军，匪首王英，伪蒙李守信适于是时至津，与日军有所接洽，图向绥远进犯。我冀察二十九军当局也准备演习，以资对抗，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严加防备，一时华北风云四合，形势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这个时候，日领事须磨从东京携了新训令回到南京。川越大使即召集日武官喜多诚一等研讨外务省训令。私底下双方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到了十一月十日，我与川越作第七次会谈，就当前紧张情势进行磋商，我方立场不变，拒谈共同防共问题，要求规复河北行政完整，安定察北、绥东。日方则否认在内蒙的阴谋活动，仍然要求“华北

自治”、“共同防共”、“取缔排日思想”那一套老词，双方无结果而散。

这十一月十日的第七次会谈，日本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报告，现根据日方的资料来回顾一下我当时就日本所提出的各项要求的反应如下：

“1. 共同防共 张群前与有田大使会谈时，中国坚持先要解决东北问题才谈华北防共。这次谈判开始，中国最初提出废止塘沽协定作交换条件，今再让步，一定要先撤消冀东政府才能进行谈判。

2. 华北问题 中国不能默视冀察现状，因为这含有承认冀东政府的意味，经济提携可以商谈。

3. 中日航空联络 中国要求禁止日机在华北自由飞行。

4. 减低关税 可以同意调整。

5. 聘用日本顾问 两国关系尚不良好，无法实行。

6. 韩人引渡问题 按前例办理。

7. 最后讨论到将这次交涉作成文书问题，张群认为这次交涉，最先是用口头，故不必要考虑到作成文书的问题；且就中国政府的立场说，将这次交涉写成文书，更是根本不可能之事。故张群强硬反对此事。本使（川越）说明，如果本使不保有此次会议纪录，今后对会谈内容均将无法知悉，势将发生种种不便事情。经本使力说，张群允俟高宗武与须磨商谈后再作裁夺。”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谓备忘录还有下文，等下再说。我

们先谈谈绥远的战争，就是百灵庙之捷。这次胜利对中国关系非常之大。

十一月十一日，日本嗾使的伪蒙军李守信和王英匪部即向绥边移动，进攻陶林、红格尔图等地，其兵力有骑、步兵二千人及飞机八架，山野炮十多门。十四日绥远战事爆发，日机曾在平地泉投弹。在酷寒的塞北原野上，战事绵延一旬，国军英勇奋战，大破敌军，追奔逐北，至二十四日，克复绥北重镇百灵庙，击溃伪军主力，于是日方策动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之“内蒙军政府”阴谋，完全失败，打破了日本想要制造为其傀儡的“大元帝国”之迷梦！这是颇为出乎日本人意料以外的事。

绥远战事发生，使刚刚勉强重新开始的中日交涉为之中断。十八日，我即派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明白告知川越大使：要是绥远工作继续下去，则中日交涉无法成立。日本外务省乃于二十一日作艰涩的辩解说：

“绥东战争，纯系中国国内事件，与日本无关，纵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为，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渺不相涉。”

日外务省还郑重声明：

“中国在其本国领土内对于侵略者无论如何痛击，日本均无理由干涉。盖御寇之能力为每一国家之基本要件也。”

日本政府在极力掩饰和推卸责任，然而日本关东军

和伪满洲国的外交部却于二十七日共同发表荒谬的公告,详述日满军双方就内蒙伪军攻绥远表示同情的原因,并说:

“日军当局对于足以妨害‘满洲国’的安宁秩序,或使中国全土布尔什维克化的事变,不能漠不关心,所以盼望内蒙成功。”

这个公告无异是日本人在中国制造事端的明白招供,然而却是和上述日本外务省否认绥远战事与日本有关的声明互相矛盾的。我外交部乃于二十八日发表声明:

“此次伪蒙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国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作用如何,自应痛剿。中国国民爱好和平,我政府本自存共存之政策,亲仁睦邻,调整国际关系,……惟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尽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

但日人并不死心,到了十二月三日,日人指挥匪伪军五千余人,自锡拉木楞庙(大庙)向百灵庙进攻,日机十余架助战,被我国军彻底击溃,伪蒙军纷纷反正,至次日百灵庙周围六十里无敌踪。绥远战事暂告一段落。

然而这时青岛又发生了问题。

在十二月二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全部停工,二万七千工人失业。第二天,驻泊青岛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十余名,突于清晨四时登陆,借口纱厂停工,搜查国民党党部及报

社等机构,滥捕职员九人,旋即释放。这次青岛事件,也是日本军部和特务机关策动,借以造成我的困难,以转移对绥远的注意力。

我得到青岛的报告后,异常重视,立刻约川越大使到外交部。当天晚上举行我和川越的第八次谈判,也是和他的最后一次会谈。我先就青岛日水兵非法行动事,向川越面提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退青岛的军队;次述绥远事件的调查事实,要求日本制止其军民参加绥东的战争。我并且告诉川越:“今日不准备商谈其他交涉。”

双方还是争执不下,吵得很激烈,没有结果,却发生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川越大使要我接受第七次会谈一份日方的《会谈备忘录》,我一看内容完全不对,是日方片面制造的,当场拒绝,但是川越不理,他把《备忘录》丢下,自行离去。我立刻叫亚洲司长高宗武追出去,川越已上汽车而去,高立即把它送回日本大使馆。第二天川越又命人投送,我又把它退回。

川越这种举动看似儿戏幼稚,其实这也是日本人不择手段,“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方式,什么伎俩都用得出来,令人防不胜防。

看看也谈不下去,过了两天,十二月五日,川越就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以后中日之间的交涉就由亚洲司长高宗武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谈判。

十二月六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详述此次中日调整国交的经过,其中有云:

“中日两国，必须以平等互惠与互尊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为基础，始可为真正之调整。……”

张部长就任后，本年三月间，即与日本现任外务大臣前驻中国大使有田氏迭次会谈，剴切说明调整中日邦交之必要。而其最正当之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庶中国领土之完整得以恢复。彼时有田大使认为东北问题之解决，尚非时机。张部长遂主张第一步至少限度，亦须先行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虽经一再讨论，终以日方并未准备为彻底之调整，未见效果。……正本清源，须恢复人民感情，铲除足以引起恶感之原因。我始终以平等互惠互尊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为立场。绥远事件障碍外交进行，切望早日消灭，一切问题，可由正当途径解决。”

次日，外交部又发表声明：

“双方交涉两月有余，各项问题中之数点已比较接近，不幸张部长屡次谈话促起日本政府严重注意取缔之绥远事件发生，致障碍外交进行。截至今日，讨论中之各问题未得结果，殊为可惜。”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日本对我国政局，亦转趋观望，中日交涉，暂呈静止状态。不过，十四日，青岛事件解决。而成都、北海两案，经高宗武和须磨的继续折冲，也于三十日互换两案的解决文件。成都事件是我出任外长后与日本大使川越茂会谈的一个导因，也是我结束与日本大使交涉的一个事件，今将我以外交部长的名

义致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去照抄录如下：

“径启者：关于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日本人四名在成都遭遇变故，其中二名受伤，二名身死一事，本部长兹代表政府，以诚恳态度，对贵国政府深致歉意。当事变时，地方当局曾弹压救护，但省会警备司令蒋尚朴及公安局长范崇实，究属疏于防卫，中国政府已将该二员免职。又警备司令部曹午堃、连长刘尧古、公安局科长郑介雄、队长孙岳军、分局长康振等，均已分别予以处分。本事件之首犯刘成先、苏德盛，业已处以死刑。其他凶犯岑群、王述清、彭定宅、刘子云等，亦已分别处以徒刑。中国政府对于死者渡边洸三郎及深川经二之遗族，各给予实在损失费及相当抚恤金。对于受伤者田中武夫及濑户尚二人，各给予实在医药费及实在损失费，其数目另文通知。本事件既照上开办法予以处理，中国政府当认为业已解决。”

川越大使旋亦复照，略称：

“中国政府给付死者之遗族及伤者各费，合计中国国币九万八千八百八十七元一角，已由本大使馆收到。现日本政府认为本事件已经解决。”

至于北海事件，亦用解决成都事件之同样方法，换文解决，其内容为：

1. 外交部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
2. 当时该地负责人员，业经遣散或去职，无从另予处分；
3. 中国政府给予中野遗族抚恤金三万元。

川越大使复文称：“日本政府认为该案业已解决。”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日交涉，就以这两案的解决而告一结束。两国交涉在中断状态下过了新年。

到了二十六年（1937年）元月二十日，我接见奉调回国而来辞行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和武官雨宫巽，我向他们表示中国的意向如下：

“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问题虽可不谈，但华北现状急需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工作。此项工作具有成效，然后始能考虑互相平等而合法之提携。贵方如能切实做到此项初步的调整工作，则我方民众军队对于贵国侵略之疑虑可除，而抵抗之观念自消。……日本之对华态度如何，影响正钜。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

元月廿三日，日本广田内阁总辞职。二月二日，日本以曾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銑十郎为首相组成新阁，这是一个不包括任何政党人士的军部官僚内阁，军人势力愈形膨胀，而且与“财界”结合，愈益向中国扩张。其外相初由林銑十郎自兼，后来才以驻法大使佐藤尚武担任。日本新阁成立，政策改变，川越大使虽于二月九日到外交部来拜访，属于礼貌性的拜会，没有举行会谈。中日的谈判遂完全停顿。

二月廿五日，我向行政院长蒋先生提出辞职。三月三日，中政会决议王宠惠（亮畴）先生继任外交部长，我则改

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结束了我一年又三个月的外交部长生涯，也结束了抗战前中日两国直接谈判交涉。两国的外交方针都告改变，谈判未继续进行。以后直到抗战发生，中日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在这半年内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外交接触，最后在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日本方面派来一个以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兼“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到南京，蒋先生曾予接见；我们也派一个经济考察团去日本报聘，这是抗战前夕中日两国最后一次正式往来。

我跟日本大使会谈，都是由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先生担任翻译。他是一个“日本通”，日本语文的造诣极为精湛，对日本事务也有极透辟的了解。我自己也懂日文，不过只在一些社交场合酬酢应用，在正式会谈时我皆使用翻译，这一来是国家体制攸关，其次是我可以听得懂对方的话，在翻译的时候，我可以有时间先考虑该怎么回答。至于日本大使亦皆娴于汉文，但都不能说流利的中国话。

总之，在我担任外交部长这一年又两个半月的期间，我们虽然主动找日本谈判，希望能够调整中日关系，减轻外来的压力，先完成“安内”的工作，政府把我从湖北调来，也是希望利用我和日本的一些因缘，来打破当时中日外交的僵局。无奈我一上任，正是日本向我提出“广田三原则”之时，而且日本国内又发生“二·二六事变”，少壮军

人的势力大张,日本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军部的行动。当时中日之间的问题,主要关键是东北问题,日本却以既得利益避而不谈,而对华北、内蒙,日方又步步进逼,制造分裂,策动自治。对我们提出的恢复河北行政完整,放弃在内蒙的阴谋活动,又往往避重就轻,拒不讨论,反过来要我们跟他经济提携,承认他的特殊利益,还要我们取缔排日思想,真是欲亡人之国,无所不用其极!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实在说来,我这一年多的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至今思之,犹有遗憾。回首前尘,匆匆四十余年了。

访日归后述感

这是战争结束后我访问日本的第四次，也是我和日本发生关系以来进入第五十六个年头。有人誉我为“知日家”，也有人称我为“亲日派”，我固不敢当，也不愿辞。因为，以中日两国地理、历史、种族、文化关系的密切，利害相同，休戚与共，两国除了“亲善合作”以外，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和日本既有超过半世纪以上的关系，对于日本国情，自然会随时关心，因之也相当的了解。五年以前，就是我上次奉命赴日答访的前后，我曾有意汇集我五十年来为双方关系而奔走资料，写一篇《五十年来中日关系与我》，只以头绪过于纷繁，我的职务实在太忙，所以一搁又是五年多了。今后哪一天能够完成这个志愿，实在没有把握。承中日合作促进会的好意，把我这次访日的言论行动连同报刊的评论通讯，辑为《访日纪要》，并且要我写一篇感言，以殿本书之末。这虽然是片段的纪录，但雪泥鸿爪，似亦不无可供留心中日关系者的参考，而为我将来写《五十年来中日关系与我》的一助。我勉力应命，爰述所感，并以就正于中日合作促进委员会诸位先生及本书读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即中日战争结束的翌年,我因事赴美,来回均经过日本,归途曾在日本停留三天,接受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招待。当时我默念中国八年抗战所受损失的惨重,又目睹破瓦颓垣的日本,触景生情,良深感喟,所接触的日本人士,也无不同表悔恨。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我奉命视察盟军占领政策,是为战后正式访问日本的第一次,勾留三星期,关于日本战后的各种问题,与麦师有多次的商谈,并视察地方军政府和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实况。一面与日本朝野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个别的恳谈。他们对于战争结束时,中国方面的宽大政策,一致表示衷心地感激。那时日本复兴工作尚刚开始,战争创痕,历历在目,回想我当年负折冲之任,而未能挽求万一,因是心中惻然,而深憾于两国酿成战争,实为重大的不幸。1952年4月,“中日和约”终于经过很多困难周折后签订成功,其间我也以私人资格,多方面协助其成,一方面参加发起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双方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民间团体,我被举为会长。八月,奉命赴日作战后第二次访问,洽商签订和约后有关双方今后合作问题,和协助我驻日使馆之恢复,并请日方友好成立日华经济促进委员会,以与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协力担负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共同使命。这次勾留达四月之久,与朝野各界接触更多,对日本战后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考察,直待使馆成立后,始行返台。1957年2月,岸信介总理来台访问,双方关系,益见增进。九月,我奉命以“总统

特使”答聘，赴日作战后第三次访问，为时凡十八日。这一次访问的时间虽短，而日本朝野接待的礼仪，甚为隆重，双方气氛，也最和谐。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曾有答访记之辑，详记其事。一隔又是六年。在这六年之中，为了双方亲善合作的关系，我对日本问题的注意以及和日本人士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并没有间断。但是因为职务过忙，到今年五月，才借参加中日合作策进会和世界道德重整亚洲中心在东京举行大会的机会，应邀赴日，作战后第四次的访问。来去共十六日。

我自信是一个真诚期待中日亲善合作的人。但我以为中日双方，纵然有其相同之点，也必然有其相异之点，所以要谈合作，必须以诚相见，从大处远处着眼，不唱高调，不摘小疵，不打零碎算盘。因之，我战后第一次访日，首在希望日人在精神上实行思想革命与心理建设；在政治上防止帝国主义思想的复活及共产势力的扩张；在国际关系上，提出建设亚洲集体安全体制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张。第二次访日，希望日本：发挥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以确保立国之根本，重建足以自卫之力量，维护国家的安全，确立坚强的反共国策，以消弭内在的隐忧，同时对太平洋各关系国家，努力调整邦交，增进合作。一面发表《中日关系与美国》一文，主张中日美三方在亚洲合作，而深深以日本“政治反共经济联共，对外反共对内内容共”为虑。第三次访日，除了重申前两次的几项主张以外，希望双方之间，先除政治的障碍，进求加强经济文化的合作。

回国以后，很多的朋友问，此行收获如何？关于这一点，我上次访问归来以后曾经有一段话：“在本人将去的时候，许多人以我和日本有五十年的历史关系而寄以甚大的期望，但是我当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到日本已有多次，每一次去，在临行以前，回想过去，辄不胜感愧。在我回来以后，有许多人以获得成功交相赞许，我心情更为惶恐。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外交，必须以长期的信心，做不断的努力。”同时又说：“回想过去，辄有无限的感愧，而展望未来，则仍寄以无穷之希望。”我这次的心情，还是和上次一样。因为我既然和日本有半世纪以上的关系，本于真知和确见，认为中日双方的亲善合作，实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一时一事的现象，绝不足以动摇我的信心和热情。所以总是时时抱着希望，刻刻不懈努力，相信终有真正实现的一天。

1952年中日和约签订以后，我曾经这样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是实现中日合作希望的第一个机会。十六年（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是第二个机会。可惜日本军阀缺乏高见与远见，不愿见中国的进步，而欲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与动乱，以遂其蚕食侵略的野心，于是把良好的机会都错过了。这次台北联合报的社论也有一段话：“要是日本朝野能够冷静地想一想，假若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日本政府便能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无间，保持革命的成果，不支持北洋军阀的割据局面，今日亚洲情势如何？假若在1926年国

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日本政府能够高瞻远瞩，与国民政府合作无间，固不致发生 1927 年的济南惨案，也不会引发 1931 年的沈阳事变，更不会有 1937 年的芦沟桥事变，而使战争延续八年之久，而致日本遭受原子弹的侵袭，则今日亚洲情势又复杂如何？”这几句话是极其沉痛而值得深思的。我以为四十一年和约订定，双方恢复邦交，又是实现希望的第三个机会。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过去这十一年之中，中日亲善合作，不但未能如我们所理想，并且依旧在障碍重重的坎坷途中。根据我这次参加集会及观察所得，日人开会治事，精神振奋，工作努力，埋头苦干，力争上游，至可钦佩。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各种享受，莫不兼备；社会习惯，大都市虽不免流于浮华奢侈，但农村以及一般民众，仍极节俭刻苦。因之战事损失，早已恢复，而经济之发展尤速。

海内外报刊，对于我这次访问都很重视，事前寄以极大的期望，事后又给予很多的评价，使我既觉惭愧，又极感激。香港《天文台》有一段话，说我：“既能说日本爱听的话，也能说日本不爱听的话，但日本人虽然听到不爱听的话，不独不会倒喝采，起反感，而且能够接受不爱听的话，忠言而不逆耳，作为警惕，加以考虑。”这样的溢誉，尤其使我惶悚。我这次的访问时间很短，又不善辞令，心中所要说的，或者还说得不够透彻动听，但是自信一本于视日本为第二故乡的立场，完全出于衷心的真诚。而日本朝野各界这次对我的热情与优遇，也同样使我十分感激，十分

感动，深情挚意，永铭不忘。我毕生致力于中日亲善合作，战前忍辱负重，为济南事件冒险奔走。其后外交部长任内，更为调整两国关系而努力折冲，遏止战祸，不计个人毁誉生死。战后再三再四仆仆道途，力竭声嘶。区区此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还以为这是标语口号。我相信日本的朋友们，一定有很多同情我的，就是一般的人，谅也不会见怪。诚能“视为忠言而不逆耳，加以警惕，加以考虑”，那我就算不虚此行了。王阳明先生有诗云：“起向高楼撞晓钟，犹多昏睡正懵懵，从今日暮醒未晚，不信人间耳尽聋”。录之以志吾感。

对日往事

六十余年来中日关系的离合演变，自然是给予亚洲大局以最大的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渐充，中山先生以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又以为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这都是站在亚洲整个立场对日本寄以殷切的希望，不仅是为了中国。原来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中国是亲日而仇俄的，那时中国青年学子，对于日本的进步，也很向往，留日学生，常在万人上下，中山先生所创导的中国同盟会，也在东京成立，并且因为地理人事的关系——离中国近，华侨又多，中山先生便以日本为革命的主要策动地，日本有志之士，同情中国革命的也很不少。要是从这时起中日两国就真诚的合作，那经过这半个世纪多的努力，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理想，早就可以实现。不料日本一跃而为一等强国以后，受了德国尼采哲学和铁血主义的浸润，沉醉于军国主义，滋长了侵略的野心，以侵略中国为目标，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公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于是激起中国人民重大的反感，由亲日一变而为仇日。而日本

军阀为欲达成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始终以分化中国内部割裂中国土地为其一贯的方针。那时日本军阀的横暴骄慢，回想起来，令人发指。戴季陶先生曾言，彼于民国十六年（1917年），奉命赴日重申中日亲善之旨，日本军部于宴别时，某陆军大臣竟致暴慢之干杯词曰：“敬贺戴先生，革命党已得南京，昔年君等仅据有广东，此一隅之地，不足以言天下，南京则是国际舞台，一国之建立，须具实力，非恃空论，日本之有今日，乃武力争战胜利而来，诸君如何？请干罢！”军阀骄矜之气，已觉不可向迩。就以我所亲身经历的几段事实来说，民国七年（1918年），段祺瑞派吴光新赴日，活动参战借款，是时适上海新闻记者亦组团访问日本，我以代表上海《民国日报》及《中华新报》资格，前往参加，表面上为参观日本新闻事业，事实上另有政治使命，即为阻此借款，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中将，即为主张借款最力之人，其目的无非为扶植军阀，我因访田中力争，辩论极为激烈，归国后曾撰《中日亲善之疑云》一文，在《中华新报》发表，表示对日本之不满。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田中已任首相，我随蒋先生同往访谈，谈到中国大局，他认为“革命军应先安定长江以南，不必急急于北伐，关于北方张阎冯之争，不妨袖手旁观，而日本在国际关系许可以及不牺牲日本权利与其他之限度内，不惜予以援助”，其不愿见中国的统一，与觊觎中国北方权益的心理，昭然若揭。十七年（1928年）继续北伐，军队必须经过济南，济南日侨颇多，我政府为冀避免冲突，

希望日军暂时撤往青岛；所需费用，由我方负担，而日军则坚持现地保护，并且借口增兵护侨，阻我由济北上，情势紧张，政府因派我赴日疏解，不意即在我抵东京之日，发生“五三”惨案，我急以电话与日本参谋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亚细亚局长有田八郎联络，并于是晚晤商解决办法，翌日往访田中义一首相，恳切陈述我方意愿，田中表示日本增兵，旨在护侨，并无影响北伐之意，允派松井部长前赴济南，晤师团长福田彦助传达意旨，我亦即遄返。时我总司令部设在徐州，福田坚持必须在日军之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陈贺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迫我为城下之盟，态度至为横蛮，我因急电田中，促松井来华，并电令福田静候和平解决，旋得松井电，约往济南或青岛会晤，经往复电商结果，与松井会于济南以南之党家庄，与松井同行者，有福田之参谋长及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等人，我则单身与会，几经谈判，费尽唇舌，才把形势缓和下来，将交涉移归外交途径办理，当时我政府的态度，就如我致田中的电报中所说：“因鉴于两国根本之利害，并遵中山先生生平之主张，极不愿事态扩大，使国民受刺激太深，影响及于东亚前途”。由于我们这样的苦心因应，方能排除万难，底定平津，完成统一的大业。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改变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在华日本军人，依然不改其骄横强暴的态度，甚且变本加厉，于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借口万宝山事件，酿成“九·一八”之变，

这是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对我国人民情感上又一大刺激。当时我国虽向国际联盟申诉,请求主张公道,但国联软弱无能,毫无实际效果,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见扩大,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复在上海挑衅,发生淞沪战争,嗣后双方虽遵国联决议停战,而日本复乘国际目光集注淞沪之际,在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一面扩大侵略范围到热河及长城各口,迫近平郊,华北形势,严重已达极点,直到订立塘沽停战协定,才算暂告段落。自然,日本军人在华虽不断作出如此激烈疯狂的举动,而他们国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改变对华政策”,“恢复中日亲善关系”的呼声,也常隐约可闻,并且为了缓和国际间对日日益不利的空气。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以标榜国际主义的广田,出任外务大臣,宣称不侵略,不威胁,表示要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而在我国方面,一本中山先生遗教,果使两国关系有法改善,能够真正合作提携,来挽救亚洲的厄运,自不惜予以同情。二十三年(1934年)秋,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氏自瑞士归国,翌年二月,王氏返任过日,以私人资格面晤广田,传达我政府善邻之意旨,希望于日本的两大原则:

1. 中日两国完全立于平等之地位,互相尊重在国际间之完全独立,故日本应首先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应取消在华领判权。

2. 中日两国应互相维持真正之友谊,凡一切非友谊行为,如破坏统一治安,及妨碍人民卫生等,皆不得施之

于对方。又中日外交方式，应归正轨，绝不用外交和平手段以外之压迫及暴力。

广田对于此两大原则，表示同意，但请中国暂时勿谈满洲问题。此后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省，虽然迭次开会，商讨对华方策，迄未能得到统一的具体方案，而广田复提出其所谓“三原则”。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蒋先生在本党五全大会阐明我国外交方针及对日态度，宣示“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以不侵略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蒋先生旋即出任行政院长，并以本人担任外交部长，深见其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与决心。本人对于外交虽非素习，但是为求实现中日亲善以安定亚洲的夙愿，抱了满腔的热忱，期作最善的努力。我的任务，是要经由外交正当途径，全面调整中日关系，就任后曾经明白地表示：

“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就中国方面言，任何问题，苟以增进两国福利巩固东亚和平为目的者，均在设法调整之列，任何方法，苟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权为基础者，均得认为调整之良

策。总之，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中日间纵不幸而有嫌怨，则世上无百年不解之仇，其间自有恢复和好之道，而解仇修好，其责任在于今日双方之具有眼光与富有毅力之实际政治家，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

民国二十五(1936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我与日本有田大使连续作四次恳切的谈话，那时有田将返国转任外相，我为使其了解中日关系之症结，坦白说明三点：

“1. 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初无夙怨，其仇日心理，完全出自被动，最近数年日方连续用武力或威胁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之对日心理，不独不能转好，且愈趋愈劣，故在此时，双方皆须表示诚意，如去春及今春，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公表之不侵略不威胁政策，务须实行，以释中国人民之疑虑，此事对中日交涉前途，东亚大局，关系甚大，务请特别注意。

2. 过去中日几年来之外交，失去常轨，两国遇一问题，如华北问题等，每每不循正常之轨道，仅求局部之解决，以弥缝于一时，殊不知此种办法，于法既属不合，于理亦说不通，故其结果，并无确定性，徒贻事后之纠纷，若长此以往，则双方外交，无从进行，即如阁下所谓使华北不受政局之影响一点，以余所见，则以后任何问题，皆须经

外交途径,由中央解决,方有圆满之结果。

3. 我人当知中日纠纷,起因于“九·一八”东北事变,故中国人民,在调整中日关系时,皆希望先将东北问题,谋一适当之解决,此方为根本之办法。倘日本能同意此一点,则日本对中国方面之要望,亦可以尽量提出,即对外谋军事之合作,对内谋经济之提携,均有希望,否则,中国之要望,日方不能接受,而日本之要望,中国亦不能容纳,则中日问题,任我人如何努力,亦终不能解决,此中利害得失,贵方似宜熟思。”

然有田始终挟持其扶植“满洲国”及华北特殊化之成见,并言明日本军人素认中国中央没有办法,故对华北问题,总希望由地方当局负责解决。这样谈来谈去,谈了四次,双方距离,总是无法接近,我归纳起来,歧见所在,最大的有五点:

1. 中国方面,认为满洲问题,必须得一适当之解决办法,否则,中日问题,即不能根本解决,但日方认为此刻不能再谈满洲问题。

2. 中国方面认为满洲问题如一时不能解决,亦可先谈其次之问题,最低限度须解决华北问题。但欲解决华北问题,须先由日本取消中日邦交之障碍物,如“塘沽协定”,“何梅谈话”以及军人间之一切约束,而日方则认为必须先由中国承认“满洲国”,而后方能谈到取消“塘沽协定”。

3. 中国方面认为日方应尊重中国主权之完整,华北

问题,当依外交途径,由中央谈判解决,不能由地方办理。日方则认为华北问题,一定先要确定华北政权之独立,由华北地方解决。

4. 日本方面亟欲与中国共同防共及订立防共协定,而中国方面则以中国已在剿共,必须满洲国及华北问题解决,始可与日商订防共协定。

5. 中国方面认为日本须先容纳中国方面之要望,而后中国方可接受日方之谈判;日方则认为须由中国方面先行表示接受日方之要求,表示亲善之诚意,而后日本方可考虑中国之要望。

有田返日任外务大臣后,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川越茂继任驻华大使,事实上上面所说各种歧见,固然依然存在,而日本军人又悍然强化华北驻军,抽调精锐部队,改作战时编制,配备新式武器,分驻平津、平绥,北宁沿线各要点,形势更趋紧张,在军人掩护下,走私愈见猖獗,加以成都、北海殴毙日侨,以及汉口日警、上海日水兵被狙杀事件,先后发生,日方更一再以阻止人民“反日”“排日”为言,从是年九月起两个月之中,我与川越有七次长时间的会谈,我一本蒋先生,凡无碍于国家自由与平等者,皆当共商解决,苟有碍于国家之自由与平等者,决不稍事迁就的宗旨,争所必争,论所当论,以严正的态度,作反复的商讨。关于阻止人民反日排日一点,我更不惮坦白而彻底的指明:

1. 消极的去除恶感:凡百行动莫不出于情感,行动纵

可暂时的勉强制止，而情感发于自然，出自环境，非政府制裁力量所可变更。中国人民果有反日者，推其心理，何尝因日本人而怀恨日本人，实因频年所受之痛苦，均由于日方之行动所致，因权利之丧失而感悲愤，因悲愤而激发于行动，若日方自此与中国人民真正修好，立刻停止一切策动，则世间无百年不解之仇，经过相当时日，中国人民之对日心理，自可渐复常态。否则，如日方继续在华策动，徒使国人日感不安，其反感更加深刻，政府虽日发一令，恐亦不能改变人民之心理。故日本在消极方面，应明白废弃武力干涉与高压态度，则人民感情可望恢复，两国邦交，庶可实际调整。

2. 积极地树立新国交：我政府虽愿尽其所能，引导人民之对日观感，但此犹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必须两国间从速树立平等新国交，一扫过去之仇恨与疑心，而使观感为之一新。因此，日本不但须停止在华种种策动，且在积极方面，必须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行政统一诚意，必如此始可永绝纠纷，而真正增进两国之邦交。

3. 认识奸人阴谋：无论何国，处于患难之时，必有利用时机加害于政府之反政府之阴谋党徒，此辈奸人，随地皆有，若辈明知杀一日人，政府必处于极不利之地位，遂设计造成不幸事件，以陷害政府，甚至挑起中日战争，亦所不惜。故日方如遇一日人被害事件，即向我严厉交涉，或竟小题大做，武力示威，则适中此辈阴谋者之奸计，而两国人民间之感情循环刺激，杀害案愈多，而日方愈压

迫，日方愈压迫，而杀害案愈多。国际政治，最怕遇到此种恶性循环，深望日本朝野人士，认识此种情形，勿堕奸人之计。

为了东亚大局，我更确切地告诉川越：“我人彼此为东亚大局计，皆有远大抱负，但彼此立场各有不同，换言之，两国外交官各为其国家，意见未免有不同之点，希望彼此努力折冲，以成有终之美。我人承认日本政府及广田首相与有田外相对调整中日邦交，皆具热心，故甚愿日政府努力使中日邦交调整可以成功，同时我人亦希望日政府认识现在中国政府为调整中日邦交最有诚意最有力量之政府，此实双方难逢之机会，如此时不能达到调整之目的，则前途更感困难”。但是川越的答复也很坦白，他说：“现在日本政府的力量，比不到中国政府，因中国政府在蒋院长指导之下，能主持一切，而日本政府目前虽无更动趋向，但明年度之预算问题，行政机构改革问题、外交问题，处处有使政府为难者，而外交问题，尤为重要”。言外之意，显示其内心也未尝不自觉痛苦，因为自“二二六”事变以后，太阿倒持，日本政府及外交当局，没有人敢于撻军人之锋，稍作主张，军人在华北自由行动，为所欲为，每假突发事件，为要挟的口实，所以双方谈商，除了成都北海两案，虽在极端紧张空气之下，仍得于国际普通条款之下解决外，其他调整关系的根本之图，始终不能获得结论，至1936年11月间，绥远局势突然扩大，交涉就无形停顿，两国全面调整关系的构想，成为泡影，我也于二十

六年(1937年)三月辞去外交部长。我之在此不惮烦地将这几段故事详细申述者,一则因为是我亲身经历之事,印象最为深刻,日方对手盛气凌人之态,历历在目,不特交涉有随时破裂之虞,实有非常人所能忍受者,惟当时我国正在全力“剿共”,又值“两广异动”之际,必先安内而后始足以言攘外,故对日不得不力持坚忍,蒋先生主持大计,负国家安危之重,苦心孤诣,至电余嘱在最困难时,可阅读行营印行的《郑子产传》,以持志养气。二则诚如我对川越所说,此时中国的政府,是对调整中日邦交最有诚意最有力量的政府,深觉这个机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错过,固然咎不在我,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失败,也不仅是中日两国的损失,而实在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大劫运,至堪痛心!“上帝要毁灭那些人,就要他们发疯”,而日本军人悍然不顾,一意孤行,终于爆发“七七”芦沟桥之变,造成了绵亘八年的长期战争。

“光明来自东方”,亚洲在古代文明中自有其光辉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教育不发达,科学落人之后,而人口众多,缺乏政治认识,土地辽阔,资源还未开发,以致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国家相互竞争侵略压迫之下,动乱不安。我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赴日考察时,曾经和麦克阿瑟将军有过一段谈话。麦谓:“今后一千年,将是亚洲世纪,世界最大资源在亚洲,几乎全未开发,人口逾十亿,占世界全人口之过半数,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者亦在亚洲,如何使全世界生活程度之高低渐趋一致,低者提高,高者

降低,实为一极大问题,余愿复述斯语,今后一千年内之工作目标,即是逐渐提高亚洲人民之生活程度,根本言之,亚洲人必须自己开发自己之资源,自己制造自己之商品,以力求自给自足,亚洲必须自成一单位,通力合作,只有‘统一’,方能引导进入适当之地位,所谓‘统一’,即系有一亚洲人民之经济圈,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共求生存,且系同谋发展”。他这几句话,固然认识了亚洲今后的重要性,也不啻为国父大亚洲主义作一注释,他说的虽然重在经济,而其在政治上、军事上必须自成一单位,通力合作,自更不必说了。

论“敌友之辨”

人类经过一场战争，可以将昔日的敌人变成朋友，历史上有很多的例证，即以中日两国的关系而论，不幸经过两次战争，一次是1894年发生的清日战争，一次是1937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

清日战争发生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际，当时日本以同文同种之邦，未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反而乘我之危，进攻中国，这一场战争，以清廷的积弱，武备未修，结果不免战败，割地赔款，订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清日战争之后，我国有志之士，不满清廷的腐败，酝酿革命，他们对于昏愦无能的愤怒，甚于对敌国日本的仇视，从大批留学生负笈东来，向日本学习，所谓“以敌为师”一事，可以得到证明，当时本人和蒋先生亦就是在这种动机之下到日本来求学，而我们所选择的还是武学堂，目的在学习日本人的武备，作返国后革命建国之用。

当时中国青年纷纷到日本来求学的另一用意，是要在海外团结志同道合之士，与国内革命党人呼应联络，酝酿革命，领导此一革命运动的领袖是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在日本结交不少的朋友，若干有远见的日本人，也同情

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加以鼓励援助,例如头山满,犬养木堂诸先生。

如果在清日战争之后,日本能够认识中国的革命运动,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则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革命政府必可与日本为友,共谋奠定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而不致与日本为敌,不幸当时日本当局,正醉心于明治维新以后向大陆发展的政策,以清廷的腐败无能,正是他们侵蚀的对象。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阻挠南方的革命势力,使国民革命的工作未能竟其全功,而当时支持袁世凯与国民为敌的,亦就是日本,南方的革命势力,不得不发动倒袁的运动,推翻袁世凯。

1941年欧战发生,正当袁世凯窃国阴谋称帝之时,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进占胶州湾德国租借地,扩大及于胶济铁路沿线,并挟持袁世凯,向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迫袁氏承认,袁因欲僭称帝位,想获得日本的支持,竟不顾国民的反对,予以接受,因此激起国内各方举兵讨袁,西南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袁氏知民意已不可抗,不得不缓登帝位,抑郁而死。

孙中山先生为使日本明辨敌友,勿助纣为虐,曾在日本与袁世凯秘密勾结之际,致函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大正三年大隈一次内阁),劝说其助国民党倒袁,而本人当时亦因上海讨袁军事告一段落,再来日本,重入士官学校攻读。

袁世凯死了之后,北洋军阀依然存在,但南方革命势

力，已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成长，广州军政府成立，中山先生任大元帅，西南各省多表拥护，与北洋政府对抗，此时日本对中国革命运动仍缺乏认识，一味扶持北洋军阀，实与中国之民意背道而驰，“五四”运动之发生，学生群众指当时之外交部长为卖国贼，即为不满北洋政府与日本秘密勾结而起。

其时正值欧战发生，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利用与日本共同参加对德作战之理由，向日本磋商大量借款（即所谓西原借款），并派其亲信吴光新赴日活动，其意在借日本之经济援助与军事装备，巩固北洋势力。当时上海各报应日本新闻界之邀请访问日本，本人代表国民党主办之《民国日报》及《中华新报》参加，上海报界访日团到达大阪之后，适段祺瑞所派之代表吴光新亦正在大阪活动，本人遂在各种集会中主张：中日应真正合作，而欲达成此目的，日本必须在平等互惠之立场和中国人利益的观点上，与中国携手，绝对避免帮助中国反动势力之某一派系，或将中国划分为若干部分，从中分化挑拨，如此中日间始有全面亲善之可能。

访问团到东京之后，知日方策划对华侵略政策最有力之人物，为当时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本人与田中原非素识，但在日本参谋本部中有不少相知之友人，因其介绍得见田中，此次会晤之用意，在探测参战借款之进度，并希望田中明了支持中国北洋军阀换取在华特权之恶果。当本人向田中询及此项问题时，田中放言高论，认为

中国不统一，日本亦受其害，而东亚前途，亦堪忧虑，惟要求中国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力量之人物为中心，以收拾此混乱分裂之局，田中心目中显然认为段祺瑞乃中国最大之实力派，故扶植段系，亦即为帮助中国统一云云。

田中此种态度，代表日本对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朝野大部分人士之意见，而以军部为其执行者，诚为两国之不幸。本人当时向田中指出：段祺瑞所领导之皖系（安徽），仅能代表中国北洋军阀部份，即就此北洋军阀而言，与皖系抗衡之军阀，尚有直（今之河北）及奉（东北）两系，均为中国人民所不满，如日本扶持中国旧军阀之一系，将引起其他各派之反感，增加中国军阀角触，互争地盘之局，必将引起中国全体民众的愤怒，对日本而言，实为短见的作法。

本人与田中之辩论，未能动摇田中对中国问题之成见，上海报界访日团返国之后，本人仍继续留在日本，向各方游说，反对参战借款，然已无补于已成之局。

迨本人离日回沪，即以“中日亲善之疑云”为题，在国民党主办之报纸发表论文，指出日本对华政策之错误，期待日人之反省，而本人奔走对日关系，亦始于此时，垂今五十余年矣！

1924年，孙中山先生由广州前往北京，商全国统一事宜，由海途路经日本，在神户讲演“大亚细亚主义”，希望中日合作，劝告日本勿作西方霸道的鹰犬，而作东方王道的干城，并望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山先生

指出：“照中国同日本关系来说，无论讲到哪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合作，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一时中日关系，已略有好转之势，由于山东悬案的解决，两国暂时相安无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武汉，翌年3月克上海、南京，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革命势力的发展，似尚存观望，币原外相于1927年1月18日在议会中说明日本对华政策，为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并慎重避免干涉内争。如果能依照此一趋势的发展，明辨敌友，勿阻挠中国的统一，则不仅中日两国邦交可以改善，而以后数十年整个亚洲的局势当亦可以改观。

不幸同年四月，主张对华亲善的宪政会若槻礼次郎的内阁垮台，由政友会主张大陆政策的田中义一大将出任首相并兼外相，突将原来渐趋合理的对华不干涉的方针，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改为采取急进的武力侵略手段。

1927年5月27日，田中内阁通过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山东，其表面上之借口，不能掩饰其为声援即将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之孙传芳、张宗昌两军阀，阻挠北伐军进攻山东之真正动机，虽然当时日本各野党及舆论多不赞成田中首相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

是年秋蒋介石因宁汉政府分裂，一度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下野归田，十一月往游日本，本人亦随行，同月五日访晤田中首相于其东京青山私邸，会谈约两小

时，并由本人为蒋先生担任传译，蒋先生首先自述继承中山先生遗志，贯彻国民革命事业，以北伐阻力尚多，因田中首相与国父有交谊，故愿就此项问题说明国民政府之立场，及其对外政策，并希望田中首相指教，田中首相答称：日本对中国国民革命寄予同情，欣见国民政府能平定南方，惟期望国民政府巩固长江以南，至于北方军阀之对立斗争，不妨冷静旁观，待其归宿。

田中之谈话，显然不愿见中国革命势力北进，其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用心，已溢于言表，其后果然发生济南事件，此次不幸事件之发生，实由日本出兵山东而起，虽经本人再往日本访晤田中首相，并由田中首相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大将赶往现地与本人会商，循外交途径解决，但中日关系自此逆转，留下日后益加恶化之祸根。

国民革命不顾日军在济南之阻挠，绕道北伐，底定北平、天津，北洋军阀已一扫殆尽，张作霖狼狈出关在沈阳被炸身死，1928年东北易帜，自此全国统一，而日本对国民政府之嫉视益甚，对中国侵略之企图益明，全国各地民众对日本之反感亦高涨。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发生，日军强占东北各省，翌年1月28日又在上海挑发战争，双方关系恶化，日本对华压迫日甚，其侵略之箭头已自东北而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国际联盟之调解，显已无助于解决中日间之危机，1935年蒋先生兼任行政院长，本人奉命出长

外交,其主要任务即为应付当前紧急之外交关系。本人就任之后,即改变“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之政策,而为主动与日本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面调整,并希望日方以后对于任何问题,皆经由外交途径解决,持此方针,锲而不舍。

这一段时期,中国政府确有以经由谈判与日本解决悬案的诚意,相信那时的日本外交当局,亦不赞成军部蛮干到底的主张。例如我就任外交部长之初交涉的对手,为有吉明大使,我首先与有吉大使会晤申述此意,双方并就广田外相的所谓三原则交换意见,有吉乃主张对华缓进之人物,为军部所不满,嗣奉调回国,翌年二月有田八郎继任驻华大使,本人先后与之晤谈四次,就中日问题全面交换意见,有田亦认为两国之间有及时解决悬案,重建友好关系之必要,不久有田即奉调外相,但是他的构想不仅和军部的意见不一致,而且与关东及华北驻屯军长官就地个别交涉继续南侵的主张冲突,在他归国就任的途中,分访平津及沈阳日本驻军司令,就给他浇一盆冷水,这一段经过,近来读卖新闻连载的“昭和史之天皇”曾有叙述,详细道出有田外相当时的心境。

有田出任外相之后,川越茂奉命使华,从1936年7月起会谈八次,此即中日外交史上有名的所谓“张、川越会谈”,中国人叫“张、川会谈”因为中国人多系单姓,就简称为“张、川会谈”,这八次会谈,真是无话不尽,但由于日方提出的条件,如承认“满洲国”之既成事实、华北特殊

化、取缔排日及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等。皆损及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无法接受,以致未达成任何协议。这一段交涉,可说是中日两国和战的重要关键,中国虽已尽最大的忍让,而日方却加紧压迫,和平交涉遂从此搁浅,诚属两国的不幸。

那时由于日本军阀对中国压迫日亟,华北各地不断发生事端,对我官兵侮辱备至,刺激全国民众反日情绪,亦至为激烈,紧张情势有一触即发之势,蒋先生仍力求避免战争,曾有“和平未到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明白宣告,在此之前,蒋先生曾口述“敌乎?友乎?”一文由陈布雷先生笔录,而以徐道邻之名义发表,阐明中日两国在历史地理及种族各方面的关系,实在唇齿辅车以上,存则共存,亡则共亡,如相互为敌,则同归绝灭,如能友好相处,则共负时代的使命。而打开僵局的责任,却全在日本。

蒋先生发表此文的用意,在对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醒,借免同归于尽之浩劫,不幸仍未能唤起日本当局之反省。

蒋先生在“敌乎?友乎”一文中,指出日本对当时中国国情认识的错误,有谓“日本以通常国家视方在革命中的中国,与中国以通常国家视军权支配下特殊的日本正复相同”,又指出:“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要算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最为彻底,依理而论,日本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时机,正是清算两国过去不快

之关系，而彻底更新国交的机会，但是日本反以为中国国民党乃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非打倒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此乃根本的错误。”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中国之抗战，在求生存与独立，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乃被迫不得已而出此，初无与日本永世为仇之意，但是日本军阀一意孤行，扩大战争，终于引起太平洋大战，不惜与世界为敌，蒋先生早在“敌乎？友乎？”一文中指出：“须知日本战胜固非中国之福，然日本战败以至灭亡，亦非中国及东亚之福……，亦何忍坐视日本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之覆辙，而遭更大之惨祸”！故于战争进行之中，与盟国会商战后问题之际，仍处处为日本民族之将来着想，良以西方国家对于日本情形之了解，自不如吾人之深切，而对于日本之关注，亦不如吾人之从长远打算，顾全东亚大局。

开罗会议中对于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原拟加以讨论，罗斯福总统曾以废除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征求蒋先生的意见，蒋先生立即答复说：“这次日本战争的祸首，实在是他们的一部份军阀，至于日本国体问题，我以为应该等到战后日本人民自己去解决，我们在此次大战之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的错误。”因此，改变日本国体之说，在会议中遂未经提出。

天皇为日本民族统一团结之象征，蒋先生深知如果废除天皇制，将使战败之日本国民精神解体，心理上遭受

极大之打击,势必将引起政治及社会之混乱,使日本难于在短期内复兴,特加以顾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世界为敌,先后对日宣战者有五十二国,迨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后,日本已不堪再战,当时的日本,在世界上举目都是敌人,没有朋友,但从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时起,日本第一个朋友便是中华民国。

我政府奉行“对日宽大政策”于日本宣布投降之翌日,向全国军民及世界广播,昭告中外我国对日本的宽大态度与不报复的政策,大意说:

“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乃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黠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要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底目的”。

在战争结束的初期,交通运输困难情形之下,短短一年之内,遣送中国大陆及台湾的日本俘虏侨民二百二十三万余人归国,但仍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以在东北苏俄占领区为多,计二十七万人,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亦有四万二千人。……

中日战争八年,中国所受的损害最大,但我政府在战后首先宣布放弃赔偿的要求,1963年中日和平条约签

订,双方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二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均颇圆满,这是值得欣慰的……

张群著《谈修养》

1954年，张岳军以兼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的身份，对研究员发表《谈修养》的讲演，十五年之后，重加修订，交《中央月刊》社，该刊后来列为丛书之一，由中央文物供应社经销，至六十年六月，不到两年，即销完八版，开始印行第九版。

全书除前言及结论外，主要内容分为养身、养心、养慧、养量、养望五个部门，这里先约略介绍其要点。

首篇“养身”论健康长寿之道，著者主张须从“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作起，他说他平生遇到很多朋友，本来身体很好，但在强壮有为的年龄，自负体力过人，或纵情声色，或恣意口腹，以致未老先衰。因此他认为保健之道应随时注意节制，以保持“细水长流”。他赞成一周工作五天，每年有定期休假制度。其次要有愉快的心情，他忆起曾在朝鲜看到一副对联：“一笑一少，一怒一老”，虽只有寥寥八个字，含义却很深远，他说：如果把它改写为“大笑一次，年轻一天；大怒一次，短寿一年”，当更精辟动听。第三，著者认为健康与劳动有关，从小养成勤劳的习惯，一生受用不尽。最后提到他有一首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

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八句话，二十四个字，可以概括他的养身之道。

“养心篇”他列举四个条目，第一目是“虔诚的信仰”。著者所谓信仰，不限于狭义的宗教信仰，而是从广义解释，每个人应该树立他“思想的中心”，换言之，应有一笃信的道理或目标，其特征为：1. 对此目标精诚贯注而不移；2. 对所信仰的道理，一生拳拳服膺而不变；3. 为实现此一道理，鞠躬尽瘁、奉献牺牲而不辞。这样有主宰，才不致为外物所牵移。第二目是澹泊的胸襟，著者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恬淡寡欲，就容易为财色等念头引诱而破坏心力的专一。他引述西游记叙述唐僧取经的故事，首先降伏一条玉龙为白马供其驱策，又收服一头猿猴作为随徒。惟其这样地制服了“心猿意马”，才能用志不纷，卓然有成。他也强调“慎独”的重要，他引汉时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夤夜拒金的故事，和英国史家麦考莱“一个人真正品格的衡量，要看他在无人发现的时候做些什么”的名言。第三目为坚毅的意志，就是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决心，著者认为此种勇气与决心，是从孟子所谓“配义与道”而来，平时养成了这种浩然正气，才能在危险关头不致为他人夺志而变节。第四目为永恒的热忱，就是指“有定向而专一的内燃力量”，维持炽热以至于永久。他引证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革命党员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与基督教传教士至食人种族之间传教牺牲，前仆后继而不辞的伟大表现，以说明这种永恒热忱的真

义之所在。

“养慧篇”说明如何才能使你有高度的智慧。他说第一要宁静，他列举大学“定静安虑得”、佛家“定生慧”，淮南子“宁静致远”、耶稣登山默祷等不约而同的获致智慧，产生灵感的方法供我们参考。第二要去蔽，就是要排除成见，他引述《列子》书中所讲的一个幽默故事：有人怀疑他邻居儿子偷他的斧头，仔细看他的言行、颜色，越看越像是一个小偷，后来无意中找到了自己的斧头，再看邻家那孩子的动作态度，却一点也不像一个偷斧头的人了。可见成见为害不浅。他举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戒条作为求取真知的要诀。第三，要有继续不断的好学精神，著者对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的精神与其“思而不学则殆”的训诫非常服膺，大学上所谓“即物穷理”的方法，就日常接触的事物、极平常粗浅的道理，切实体察，正是智慧的来源。最后是实践，就是要以力行来求真知的贯彻。这点与王阳明“知而不行是谓不知”的话相互发明，也是力行哲学所谓“不行不能知”的注脚，这点提醒注意养慧的人，要明白知行是一贯的。

“养量篇”说明如何才能使度量宽宏。著者认为第一要谦抑，谦才能容人，“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才能是尊贤容众的度量。谦的反面是骄，著者引述新旧约全书中多处阐述骄必败的教训，和“自卑的必升为高”一类的话，劝人不要夜郎自大，而落入“井底蛙”之可怜情景。其次要宽恕，他指出现代的民主政治一切以民意为依据，如

不能“恕以相谅”，就难以牺牲己见，舍异从同，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了。再其次要忍耐，忍耐就是“不与人争气”，不争就是量大。他列举孔孟和耶稣如何忍忿制怒，对待横逆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也特别指明忍耐不是妥协，忍耐是控制“血气之怒”。血气之怒是不可有的，忍耐不是消灭“义理之怒”，义理之怒是不可无的。他又说明忍耐不是消极，“存心忍耐”仍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新约中保罗的话）。最后提到要“协和容众”，他引述荒漠甘泉诠释“万事（万物）互相效力”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各种不同的颜色，即使不是悦目的，也有需要，它们可以织成美丽的图案。各种不同的音调，即使有不柔和的，也有需要，它们可以编成一支动听的歌曲。……你把一根线、一个音符、一只齿轮拆开来看，也许是没有效用、没有美感的，但把各种颜色的线编织了起来，各种音符结合了起来，各种零件装配了起来，你可以发现，结果是多么完美的调和。”著者接着发挥了一段很长的大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水乳交融的方法，以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最高做人境界。入情入理，读了之后通身血脉舒畅。

“养望篇”的主旨，不是说要如何标榜你自己，而是说如何来培养社会对你的信赖，才能集合众人的力量创立事业。著者列举下列几点培养的方式：1. 以公诚化忿怨。他认为言行忠信笃敬是与人和谐相处的原则，他以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为以诚感人

的实例。2. 以负责树众信。著者认为做事负责尽职,反求诸己无愧于心,终久必能得到大众的信赖,在社团中成为领导的人物。3. 以服务为领导。著者引述耶稣对门徒的话“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和苏轼的话:“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认为“以服务为领导,可说是千古不易的至理”(著者原语)。4. 以牺牲求创新。著者又引述耶稣的名言:“一粒麦子不落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地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认为为了创造自己和国族未来的伟大生命,经常需要个人贡献一切力量,甚至牺牲自己这渺小而短促的生命,以谋求大我生命的延续和光辉,勉励大家本“成仁取义”的精神,以“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

在本书的结论中,著者指出上述五种修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诚,二是恒”。诚是真心要做,恒是不断去做。换言之,就是从事修养,必须精诚无间,才能有所成就。

著者为了证实其论点,表示非出自他一人的独见,全书引证中外圣哲的故事、名言和古今谚语达二百一十处,其中经说明引自某书或显然可以看出来自某书的,至少有中西名著四十多种,可见著者不但“经史烂熟胸中”,更是冶中西哲理于一炉。我们有时读大部头小说,看完厚厚的一册,只得到一两句真理的启示。但在这一短悍篇幅的书中,至理名言,俯拾即是。付最小的代价,得最高的报酬,算是经济实惠的读书了。

本书著者对“应该”修养的话说得极少，而对“如何”修养的话说得很多，所以这本书可以列入方法论的范畴。方法贵在可行，如无可行、或行之而效用不大，那就不是好的方法。我们平常阅读修养有关的论著，最怕陈义过高，空有理论而无入手的方法，不免废然兴叹。本书没有留给读者这样的遗憾。著者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验告诉青年朋友，娓娓道来，读之亲切有味。又著者为一基督徒，基督徒说话重在有“见证”，他在这本书中所说的，的确是有事实作见证的。他以九十高龄，至今神明朗澈，步履安详，处事周到，这不是养生有道，何能如此？去年他患过一次重病，他以平静的心境与现代化的医药合作，竟能转危为安，履险如夷，更是身心交养的实证。两年前著者贺张大千先生寿诗中有两句话：“敦槃鼎鼐各艰辛，忍事降心迹已陈。”这是事实，当年著者办理中日外交，主管全国最高行政，蒙谤任怨，不一而足，在在可以看出其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乐众的养量工夫，而由坚毅意志、永恒热忱所得来的养心效果，亦从其艰难事业得到印证，著者操虑宏远，献为卓著，数十年来为“国家元首”所倚畀，隽语嘉言，为海内外知识分子乐于引用，岂非其养慧工夫有过人处？一个人的物望崇高，决非偶然可以幸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本书写作水准很高，而行文流畅好读，无怪出版不到两年，销行即达八版。（现第十版即将售罄）

如果吹毛求疵，本书的缺点，似乎要高中以上的程度

才能阅读,大专学生读它才能有较深的体悟,中年以上的人才觉得津津有味,实获我心。有次笔者参加一项会议,左边坐的是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右边是“教育部长”,他们彼此闲谈,院长先生说:我们小的时候,学校有“修身”一课,至今不忘其内容,现在应该恢复才好。“部长”先生说:我们“公民”课中有关于修身的材料。院长先生说:现在公民教材中关于政治常识部分多,修身教育部分少,仍不如“修身”一课感人至深。“修身”是笔者儿童时代的小学课本,谈修养的确是要从小就奠定根基。本书内容很可采为“修身”教材,但可惜小学生没有读本书的程度,因为对他们来说,文字未免太深奥了一点。小学和中学生所不能读的书,销量毕竟是有限的。书店乐于销售中小学的读物,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话说回头,善饮茶的人,高兴茶味苦涩一点,饮酒亦然。他们认为甜度太高,易于入口的饮料,没有回味,不是高品。这点似乎与读书的道理有相通处,古人有言:“读书须似食鸡跖”,认为好书要慢慢地啃,细细地嚼,如果一览无余,那就未免太平凡了。基督教圣经《新旧约》,是世界各地长期畅销书,但有些内容未必人人能懂,直到一读再读,久而久之,才会觉得强光耀目,真理轧心。有一位国学大师说他自己每年必读《论语》一遍以上,每次的感受不同,年纪越大越觉得书中的话语隽永有味。如果这样来体认,上面所说的缺点也就不算是缺点了。

笔者阅读此书,不只是一二遍的事了,偶述个人的观

感所及，借与本书其他广大读者的心灵相互沟通，并为“中副”鼓励撰写书评的号召，抛砖引玉。至于是否合乎“中副”书评的标准，那就不敢说了。但自信不是仲父先生《书评、评书》一文中所说的“广告”意义，因为销行十版以上的书，已拥有足够的读者，实在不需要任何人再来为它作义务广告了。

张群简历

张群(1889—1990) 字岳军,四川省华阳县人。保定军校肄业。1908年赴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回国在上海参加陈其美领导的战役。沪军都督府成立,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任蒋介石组织的第二十三师参谋。1913年讨袁失败,再赴日本。1916年回国,任浙江省督署参谋。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1924年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国民党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同济大学校长,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市长,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期间,历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5年参加国共重庆谈判,同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谈判停战问题。1947年任行政院院长。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同年底从香港到台湾。1950年,当选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

任中央评议委员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1951年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1990年12月14日于台北去世。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